成大中文學報　第八十九期
2025 年 6 月　頁 115-160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之版本系統考察——從補刻、覆刻、後印、雕版字樣學的線索切入

林玟君*

摘　要

本研究聚焦於《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明萬曆 14 年刊本）東傳日本後的版本流變與傳播情況。自元祿 7 年（1694）京都林文會堂九兵衛首次修訂補刻，至安永 8 年（1779）重刊，期間經歷多次補刻、覆刻與後印。本文通過比對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余圯儒刊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探討明刊本與和刻本之間修訂、遞修、重刻、補修與後印的複雜版本系統，梳理其出版與流通的歷史脈絡。研究採用雕版字樣學與筆跡鑑定的方法，結合對版下清書（筆耕）書法技巧的分析，從技術穩定性與個人特徵等線索，配合板刻行款的比對，揭示「覆刻」並非「原版複製」的歷史事實，重新釐清現存《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各版本間的系統關係與傳藏譜系，為相關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關鍵詞：《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京都林文會堂九兵衛、補刻、覆刻、雕版字樣學

* 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A Study on the Textual System of *Li Zhuo Wu's Annotated Shi Shuo Xin Yu Bu*: Insights from Supplementary Printing, Reprinting, Subsequent Impressions, and Woodblock Typography

Lin, Wen-Jiun
Postdoctoral Fellow, Center for Digital Cultures,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extual transmission and versional evolution of *Li Zhuo Wu's Annotated Shi Shuo Xin Yu Bu* (Ming, Wanli 14, 1586) after its introduction to Japan. From the first revision and supplementary printing by Hayashi Bunkaido Kyubei in Kyoto (Genroku 7, 1694) to its reprinting in An'ei 8 (1779), the work underwent multiple processes of supplementary printing, and subsequent impressions. By comparing the edition at the Japanese Institute, the research analyz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ing edition and Japanese woodblock editions through woodblock typography and handwriting analysis. This study analyzes manuscript calligraphy, scribal practices, and material features such as layout, format, and paper, revealing that "reprinting" did not necessarily replicate the original. It redefines the textual system and transmission lineage of extant *Li Zhuo Wu's Annotated Shi Shuo Xin Yu Bu* editions, offering new insights into their publication and circulation.

Keywords: *Li Zhuo Wu's Annotated Shi Shuo Xin Yu Bu*, Kyoto Hayashi Bunkaido Kyubei, Supplementary Printing, Reprinting, Woodblock Typography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之版本系統考察——從補刻、覆刻、後印、雕版字樣學的線索切入*

林玟君

一、前言

《世說新語》是六朝志人筆記名作，亦被視為研究漢末魏晉之際歷史、語言、文學與思想的重要材料。該書由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所著，史稱他「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1]書中採集前代遺聞軼事，並類分德行、言語等三十六個門類，涵蓋帝王卿相到士庶僧徒等重要人物。至明代，王世貞（1526-1590）對各家傳本進行選擇與增補，將宋元時期人物記事加入其中，重刊成《世說新語補》，該版本隨後成為流傳最廣的《世說新語》版本。

爾後，王世貞《世說新語補》傳入江戶日本，引起古文辭學派（蘐園學派）及相關交游人物的高度關注與興趣，包括那波魯堂（那波師曽，なわ/なば しそ，1727-1789）、岡白駒（おか はっく，1692-1767）、石島筑波（いしじま つくば，1708-1758）、秋山玉山（あきやま ぎょくざん，1702-1764）、服部南郭（はっとり なんかく，1683-1759）、太宰春台（だざい しゅんだい，1680-1747）、戶崎淡園（とさき たん

* 本文為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近世初中期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と和刻本漢籍の流通史——覆刻・翻刻・後印を手掛かりに—」（計畫編號：23K18656）之研究成果。論文初稿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之「2023 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23 年 12 月 15 日-17 日）。謹此感謝與會討論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熙遠研究員，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閱讀與寶貴建議。此外，筆者亦感謝在日本任職外國人研究員期間，蒙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高橋智教授與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文庫長堀川貴司教授惠予和漢書誌學方面之指導，特此致謝。

[1] 唐・李延壽撰：《南史（底本：元大德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網站，網址：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0^2132653306^90^^^../hanjimg/hanji.htm（2025 年 1 月 15 日上網）。

えん，1724-1806）、松平賴寬（まつだいらよりひろ，1703-1763）等。荻生徂徠（おぎゅう そらい，1666-1728）更在其《示木公達書目》中指出，《世說新語補》是「右吾黨學者必須備坐右不可欠一種」，即該書被視為古文辭學派（蘐園學派）的「必讀書目」[2]之一。

順此脈絡考察和刻本《世說新語補》流傳情況，元祿 7 年（1694）與安永 8 年（1779）刊行的兩和刻本相隔 85 年，兩者皆標註為京都文會堂出版。實際上，元祿 7 年本出版時，京都文會堂由儒者出身的初代林九兵衛（儒者林義端，はやし ぎたん，生年未詳-1711）經營；而安永 8 年本出版時，則應由林九兵衛的後代負責。根據各本書後刊記可知，安永 8 年本的再版極有可能是由陶山南濤作為林九兵衛代理人，並與林九兵衛侄子林權兵衛合作進行。林權兵衛，繼承林九兵衛的書肆及其版木所有權，並經營京都「文泉堂」，被視為「林九兵衛二代目」，且依據元祿 9 年的校勘與修訂，再次出版此書。[3]

若將版本範圍聚焦於「李卓吾批點本」，考察臺灣、中國、日本等地的藏本，結合序跋、全書結構及雕版字樣等特徵，則現存《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明刊本與和刻本）版本，可以大致歸納為以下五種：

1、明萬曆 14 年刊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以下簡稱為甲本）

2、書林余圯儒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以下簡稱為乙本）

3、明萬曆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服部文庫藏）（以下簡稱為丙本）

4、元祿 7 年京都文會堂刊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雲英文庫藏）（以下簡稱為丁本）

---

[2] 江戶・荻生徂徠：《荻生徂徠全集》第 1 卷（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 年），頁 537。相關考察可參見林玟君：《楊慎「六朝學」研究——兼論江戶時代荻生徂徠的容受》（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0 年）。

[3] 關於和刻本《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在江戶時期的刊行，見〔日〕稻田篤信：〈和刻本『世說新語補』の書入三種〉，《日本漢文學研究》第 8 號（2013 年 3 月），頁 1-17。此文中僅提及兩部和刻本皆由京都文會堂林九兵衛刊行，並未詳細說明出版狀況。筆者根據原本調查結果，於本文增補兩部和刻本的實際出版貢獻者，並從雕版字樣學分析覆刻本再版過程中的技術差異，包括版下清書等職人間的工藝，以及書物呈現的出版與書志流傳特徵。

5、安永 8 年京都文會堂再刊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土歧文庫藏）（以下簡稱為戊本）

甲本現存於臺灣國家圖書館，是《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各版本中最為完整者，亦被認為是該書原刊本（原刻本）。然而，根據版面上板木經過多次印刷所留下的損耗與磨滅痕跡，國圖所藏並非初刷本。舉例而言，卷 6 第七葉下左側最末行的板框，顯示出多次印刷後的磨損痕跡，且左下角的缺損為板框在印刷過程中遭碰撞所致。類似情況也出現在卷 8 右側板框，字跡模糊的現象表明版木在反覆印刷過程中損耗，因此，該本應屬再印本（後印本）。

該本書前所附序文與書末跋文的撰寫者依序為：〈世說補序〉焦竑（「瑯琊澹園焦竑撰書」）、〈刻世說新語補序〉陳文燭（筆者考證：該序文國圖甲本雖脫落最後半葉，但與其他版本比對可確定為陳文燭所撰，款識「萬曆丙戌龝日沔陽陳文燭玉叔撰」），〈世說新語補序〉王世貞（筆者考證：該篇序文書法由蔡拱日所書，並附有款識「嘉靖丙辰季夏琅琊王世貞譔」[4]）、〈世說新語序〉王世懋（筆者考證：該篇序文最後半葉包含王世懋再次題書之識語，款識「萬曆庚辰秋吳郡王世懋譔」）。此外，書中還包含〈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舊序二首〉劉應登（「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5]）與袁褧（「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褧撰」）、〈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董弇（「紹興 8 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弇題」）、〈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陸游（「淳熙笠澤陸游書」）、〈何氏語林舊序二首〉文徵明（「辛亥四月之望文徵明書」）、〈何氏語林

[4] 筆者案：此處《臺灣國家圖書館「古典籍特藏文獻資源」》網站所登錄的書誌資料，誤作「譯」字，正確應為「譔」字，參見《臺灣國家圖書館「古典籍特藏文獻資源・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網站，網址：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5fff00dcf8f4465faca7613e6b38824afDc0NTA40&page=1&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2025 年 1 月 15 日上網）。

[5] 筆者案：此處《臺灣國家圖書館「古典籍特藏文獻資源」》網站所登錄的書誌資料，誤作「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題為序」，「端」右側有小字旁點，輔助斷句，正確應為「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參見《臺灣國家圖書館「古典籍特藏文獻資源・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網站，網址：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5fff00dcf8f4465faca7613e6b38824afDc0NTA40&page=1&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2025 年 1 月 15 日上網）。

舊序二首〉陸師道(「長洲陸師道撰」)等。全書最後所附跋文為〈題世說新語補後〉，由王泰亨撰寫(「乙酉春二月既望琅琊王泰亨識」)。

其中，王世貞序文撰於嘉靖 35 年（1556），王世懋（1536-1588）序文撰於萬曆 8 年（1580），而全卷末王泰亨跋文（後題）作於萬曆 13 年（1585）。根據書前陳文燭（1525-1595）序文的內容推測，該書的板刻刊行時間應為「萬曆 14 年（1586）」。此外，前輩學者王能憲於其著作《世說新語研究》[6]第二章中，提及安永 8 年刊行的和刻本是以萬曆 14 年本為底本，但該和刻本與原刊本在某些細節上有所不同。例如，安永本書前未錄有焦竑序文。根據筆者調查，目前錄有焦竑序文的版本，除國圖所藏 20 卷 10 冊本外，另見於臺灣大學圖書館總館所藏同版本。此外，天津圖書館亦藏有一部明萬曆刻本《李于麟批點世說新語補二十卷附釋名一卷》（後印本）。該版本在卷 4 卷之五之前，將卷首書名的「李卓吾」（1527-1602）之名改刻為「李于麟」，而其他各卷仍保留「李卓吾」的雕題。此外，部分尾題出現「李□吾」的情況，中間一字被挖去，這可能與李贄的著作數次遭禁毀的歷史背景相關。該版本雖保留了焦竑序，但文徵明（1470-1559）等人所作的〈何氏語林舊序〉則被刪除。值得注意的是，據筆者校勘，國圖所藏之《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原本再印本，明顯缺少〈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凡例〉一篇，推測應為裝釘過程中遺漏所致。倘若無此誤，則無以合理解釋書名標示「李卓吾批點」卻無相關凡例之矛盾現象。為進一步比勘，筆者取天津圖書館藏同一版本之後印本進行對照，則可見在〈長洲陸師道序〉（即〈何氏語林舊序二首〉之二）之後，即有〈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凡例〉兩葉，其內容共十則，可補國圖本之闕。此一對勘，不僅證明國圖本之殘缺，亦顯示〈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凡例〉之存在原屬書前應備之構件。[7]

乙本的最大特徵在於其封面（筆者案：確切位置為「見返し」[8]）上記有「書林

[6]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頁 76。

[7] 感謝匿名審查人惠賜高見，指出國圖本《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之所以闕漏〈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凡例〉，疑為裝釘時遺漏所致。本文即據此建議，參考天津圖書館所藏同一版本之後印本，補全相關考證內容，謹此致謝。

[8] 「見返し」（みかえし）在和書書誌學是指書籍封面內側與書頁連接的部分，通常由一片紙張覆蓋連接書封與書頁，使書籍裝訂更加牢固並提升其美觀度。通過比較「見返し」的設計、文字或材料，可

余圯儒刊本」，現存的各刷本分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與關西大學圖書館等地。本文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為依據，該版在凡例十則、目錄、書前附錄釋名及全書正文內容上，均與甲本一致。然序文部分有顯著刪減，書前僅錄有劉應登與袁褧的舊序二首，董弇與陸游（1125-1210）的〈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及文徵明與陸師道（1511-1574）的〈何氏語林舊序二首〉。陳文燭、王世貞、王世懋等人的序文及王世懋的識語，均未收入乙本。

丙本現藏於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服部文庫，至今尚未有任何先行研究深入探討該本的書誌特徵。該本凡例十則、目錄、書前附錄釋名及全書正文內容，雖大致與甲本、乙本一致，但書前首先錄有王世貞〈世說新語補序〉，此篇序文由蔡拱日書寫，款識明確標示「嘉靖丙辰季夏琅琊王世貞譔」，內容與甲本所錄完全一致，保留了原刻本的初始樣貌。其次為王世懋〈世說新語序〉，該篇序文的最後半葉仍保有王世懋再次題書的識語：「萬曆庚辰秋吳郡王世懋譔」。再次為陳文燭〈刻世說新語補序〉，此篇序文於丙本中全篇完整收錄，相較於甲本殘缺的部分，提供了更為詳細的刊刻背景資訊。此外，全書最後錄有王泰亨所作的跋文〈題世說新語補後〉，內容與甲本一致，其款識為「乙酉春二月既望琅琊王泰亨識」。

丁本為元祿 7 年（1694）京都文會堂所刊和刻本，各刷本分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內閣文庫、東洋文庫、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等地。本文所據版本包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藏本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雲英文庫藏本，但由於影像授權限制，書影圖版採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雲英文庫藏本。

鑑別不同版本間的細微差異，確定出版時間、版本次序，甚至推斷書坊之間的關聯性。就其位置與機能觀之，與中國古籍中所謂「扉頁」有一定對應關係——後者亦常位於封面與正文之間，作為過渡或保護頁，且有時書寫書名、卷數或鈐印。然而，「見返し」與「扉頁」在實作層面仍具差異。就製本習慣而言，中國古籍之「扉頁」多數作為實用性輔助頁面，其裝飾性較低，紙質亦無特殊規格。而和本古書所用之「見返し」，常選用染紙、金銀砂子紙或墨流紙等，兼具視覺意象與藝術品味，反映出江戶時代出版文化中對書籍美術表現的高度重視。因此，雖「見返し」與「扉頁」在基本機能上皆具有裝幀保護與頁面過渡之作用，然其在製作技術與視覺審美上的呈現，則深受各自書籍文化體系之影響，不可簡單等同視之。

該本的書皮（筆者案：日本和漢書誌學稱為「表紙」）採用江戶時期常見的藍色系封面，其書籍尺寸比原刊本稍大約 0.1 公分，這可能是因覆刻時版框重刻與紙張裁切工藝不同所致。自序文開始，正文及跋文中皆增刻有小字訓讀符號。書前所附錄的內容依序為：王世貞〈世說新語補序〉（此篇序文由蔡拱日書寫，款識「嘉靖丙辰季夏琅琊王世貞譔」）；王世懋〈世說新語序〉（此序文末半葉仍保有王世懋題書的識語「萬曆庚辰秋吳郡王世懋譔」）；陳文燭〈刻世說新語補序〉（款識「萬曆丙戌龝日沔陽陳文燭玉叔撰」）；劉應登〈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舊序二首〉（「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袁褧〈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舊序二首〉（「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褧撰」）；董弇〈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紹興 8 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弇題」）；陸游〈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淳熙笠澤陸游書」）；文徵明〈何氏語林舊序二首〉（「辛亥四月之望文徵明書」）；陸師道〈何氏語林舊序二首〉（「長洲陸師道撰」）；以及全書最後附錄的王泰亨〈題世說新語補後〉，款識「乙酉春二月既望琅琊王泰亨識」。

丁本刊記與傳統刊本將出版資訊刊於書末別葉不同，直接刻於原先書末王泰亨跋文之後，利用未經刨木處理的約四行墨釘（墨格）空白部分，將覆刻的王泰亨識語與新增的和刻本刊記合併處理，形成一半葉刊記。其內容以寫刻體呈現：「（低一字）元祿 7 年甲戌八月之吉」「（低二字）京東洞院通夷川上町」「（低七字）林九兵衛梓行」。

戊本為和刻本，現存各刷本分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內閣文庫、東洋文庫、慶應義塾大學、早稻田大學等藏書地，本文所據則為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與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土歧文庫藏本。歷來和刻本與各大館藏地的著錄，該本皆題為「安永 8 年京都文會堂林九兵衛據元祿 9 年修印本重校刻」，實際上初代林九兵衛，也就是儒者林義端本人，早在正德元年（1711）便已逝世，繼承初代林九兵衛的代理人，「二代目林九兵衛」，其實是與林義端同為伊藤東涯（いとう　とうがい，1670-1736）「古義堂」弟子，且與林家關係密切的陶山南濤（すやま　なんとう，生年不詳-1766），而板木（板元）的權利早先於林義端經營時，雖已登記為「京都文會

堂林九兵衛」，但實際出版事業的運行，在林義端後期便漸漸地由陶山南濤與其姪兒，也就是京都文泉堂林權兵衛合作，舉如寶曆 7 年九月《通俗水滸傳》初編、安永元年十二月《通俗水滸傳》中編、安永 8 年《相法摘要》，都是「林九兵衛」與「京都文泉堂林權兵衛」共同合作出版，因此，戊本的出版也極有可能是在二者合作之下再度刊行，據此，更可得知：前文所述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一書所述「安永 8 年出版的版本是繼承萬曆 14 年本」之一事，需再加以修正，實際上安永 8 年的戊本是元祿 7 年覆刻本的修印本，雖說是「修印本」，但書前所附錄的序文、凡例、目錄、正文、書後跋文，內容皆相同，所修之處多為和刻本專有之訓點小字，用以輔助漢文訓讀之符號，特別是針對元祿 7 年刊本經多次印刷損耗後，磨滅不清的和刻本訓點加以增修，實際在漢文內容上，僅於全書最後又附錄一篇守山碕允明[9]撰作的〈重刻世說新語補跋〉，文末款識為「皇和安永己亥正月守山碕允明謹撰」。

由是，整理上述《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五種版本系統之間的全書組成差異及出版經緯，則五種版本系統之間的「修」「刊」「印」關係，可先初步重新歸納如下（見圖 1）：

1、原刊本（初刻本）（後印本）‧明萬曆 14 年刊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甲本

2、修本‧書林余圯儒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乙本

3、遞修本‧明萬曆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服部文庫藏）‧丙本

4、覆刻本‧和刻本 A‧元祿 7 年京都文會堂刊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雲英文庫藏）‧丁本

5、重刻本‧覆刻修印本‧和刻本 B‧安永 8 年京都文會堂據元祿 9 年修印本重校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土歧文庫藏）‧戊本

[9] 「守山碕允明」即為常陸國守山藩藩儒「戶崎淡園（1724-1806，名為哲，字子明、哲夫，號淡園，通稱五郎太夫）」，常陸松川人，家族仕於水戶藩支藩守山藩，一生奉徂徠學之學風。十八歲入藩仕途，歷任御徒組、藩校養老館講官與家老職，深受藩主倚重。享和元年致仕後，改稱淨巖，潛心經學研究與著述，其經學注釋著作數量甚多，於漢學史上具重要地位。參見《朝日日本歷史人物事典》網站，網址：https://kotobank.jp/word/%E6%88%B8%E5%B4%8E%E6%B7%A1%E5%9C%92-1094519（2025 年 6 月 18 日上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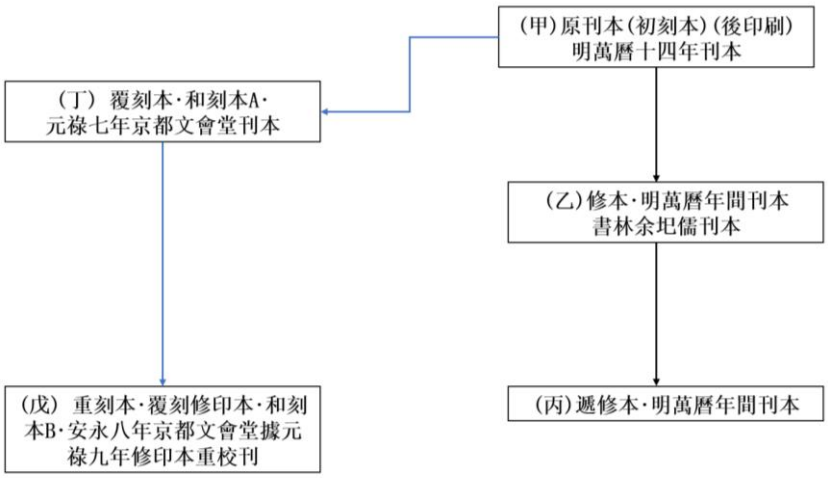


圖 1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明刊本—和刻本) 五種版本系統「修」「刊」「印」關係圖 (I)
(資料來源：本表根據臺灣與日本各地圖書館所公開之《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書誌資料，並參酌前人研究成果，由筆者初步整理歸納並繪製而成。)

歷來關於《世說新語》的研究，多聚焦於文學、哲學層面。例如，「世說體」這一人物筆記體裁的承衍與變化，以及各版本文本內容的比勘等。[10]然而，從漢籍書誌學的角度切入，專門探討現存《世說新語》版本間的傳藏、刊印關係，以及雕版職人筆下清書的工藝細節、出版文化的深層脈絡等方面的研究，相對稀少。本研究嘗試從多角度對《世說新語》的版本特徵進行考察，包括版本流傳、文獻特徵、板刻書法、雕版字樣學與筆跡鑑定等，重新構築日本江戶時代初期出版業者對「唐本」的覆刻（翻刻）與再版過程，並深入探討版下清書（筆耕）工匠的技藝對出版過程的影響。

10 劉家幸：《日本江戶漢文世說體著作之受容與生成》(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年)。劉家幸：〈平安朝和漢文學對《世說新語》之受容〉，《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頁 161-192。

二、《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版本與解題

李卓吾批點本《世說新語補》歷來研究已將其版本系統大致歸納為七類，其中兩類為清代刊本系統。本文所考察的五種版本則聚焦於「明刊本－和刻本」的傳播與覆刻、重刻情況，包含前人研究未曾涉及的遞修本。本節旨在綜述上述版本的書誌特徵，各版本的調查與閱覽均以原本為依據，以確保研究資料的可靠性與精確性。

（一）各本的共同書誌特徵

【書名（正題名）】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根據每卷卷首題名）

【其他題名】世說新語補（書序題名）

批點世說補（版心題名）

世說補（書序題名）

【體裁】20 卷 10 冊

【書皮（表紙）[11]】（明刊本）原裝香色無地表紙

（和刻本 A）縹色唐草表紙、（和刻本 B）青鈍色蜀江錦表紙

【裝幀（裝釘）[12]】四針眼釘法（四目綴釘法）、上下包角

【外題】原題簽剝落破損嚴重，原題簽外題未見

【內題】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一（卷首）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一（卷尾）

---

11 在日本和書與漢籍書誌學中，書籍封面（書皮）被稱為「表紙」，其製作與設計不僅承襲東亞古籍的裝幀傳統，亦具有地域性特徵。研究者通常會對「表紙」進行詳細調查，包括其尺寸、材質、文樣與裝飾技法等。例如，文樣可能採用唐草紋、雲龍紋等傳統圖案，而材質則多為和紙、綾紋紙或其他特製紙張，部分還會加以染色或箔押處理。此類調查對於分析版本流傳與工藝特色具有重要價值，亦能進一步揭示書籍製作時期、地域及其文化背景。參見〔日〕長澤規矩也：《漢籍解題》，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 10 卷（東京：汲古書院，1985 年），頁 32-38。〔日〕小川剛生、中野真麻理編：《表紙文樣集成》（東京：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調查收集事業部，2004 年）。

12 長澤規矩也在其著作《漢籍解題》中指出，對於中國古籍的裝訂方式，應稱為「裝釘」，而非「裝訂」。其強調，裝釘是指將書頁以釘子固定在一起的裝訂方式，這種方式在中國古籍中較為常見。因此，對於中國古籍的裝釘方式，應使用「裝釘」一詞，以更準確地描述其特徵。見〔日〕長澤規矩也：《漢籍解題》，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 10 卷，頁 32。

【出版】〔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宋〕劉辰翁批、〔明〕何良俊增、〔明〕王世貞刪定、〔明〕王世懋批釋、〔明〕李贄批點、〔明〕張文柱校注

【書序一】四周單邊手書上板，每半葉五行十字，版心花口，上刻「批點世說新語補」，約第三字高度刻單黑魚尾，第五字高度刻「序」字，第九字高度刻葉次「一（～四）」，寫刻體，行楷，文章內容共計三葉半，總計四葉。「世說補序／子與孟夫子曰尚論古之人／……／（低三字）瑯琊澹園焦竑撰書／（刻印陽文方印「弱／侯」、陰文方印「太史／氏」）」。

【書序二】四周單邊，有界，匠刻體（明朝體），每半葉六行十三字，右側有句讀旁點，版心花口，上刻「世說新語補」，約第五字高度刻單黑魚尾，第六字高度刻「序」字，第十字高度刻葉次「一（～三）」，文章內容共計三葉，國圖本缺最後半葉。「刻世說新語補序／往余讀世說新語、輒手之不釋、蓋／……／萬曆丙戌龝日陳文燭玉叔／撰」。（筆者案：明刊本與和刻本在序文排列上有所不同。明刊本中，陳文燭序文位於焦竑序文之後，和刻本中，該序文則被安置在王世貞與王世懋的序文之後。）

【書序三】四周單邊，無界，手書上板，每半葉五行九字，版心白口，上刻「世說新語補」，約第四字高度刻「序」字，第七字高度刻葉次「一（～三）」，寫刻體，行草，文章內容共計三葉。「世說新語補序／余少時得世說新語善／……／嘉靖丙辰季夏瑯琊王世／貞譔／（低二字）秣陵蔡拱日書」。第三葉上上方單欄方框內（2.4 X 8.5 公分）刻有眉批「李云與經／生清言竝／稱似貶之／太過王導／溫嶠謝安／皆清言也／用之介胄／何如哉吾／未見經生／而介胄者／也」。

【書序四】四周單邊，有界，手書上板，每半葉五行十二字，右側有句讀旁點。版心花口，約第一到第三字高度刻「世說新語」，約第四字高度刻單黑魚尾，第五字高度刻「序」字，第八、九字高度刻葉次「四（～七）」，寫刻體，行楷，文章內容共計三葉半，最後半葉則刻小字識語，總計四葉。「世說新語序／易稱書不盡言々不盡意然／……／萬曆庚辰秋吳郡王世懋譔」。識語，半葉十行二十五字「（低一字）予刻世說豫章舊所病鈎棘難通者、亦既有倫矣、惜也子固讎對／……／此意相與商求之是歲乙酉初春、世懋再識」。

【書序五】四周單邊，分上、下二欄，上欄有二處眉批，但版式未統一，第一葉上、第二葉分為三欄，第一葉下則分為兩欄。下欄有界，每半葉九行十八字，右側有旁點，作為句讀與標示重點之用。版心花口，上刻「批點世說補」，約第六字高度刻單黑魚尾，第七字高度刻「序」字，第十三字高度刻葉次「一（～二）」，匠刻體（明朝體），楷書，文章內容共計二葉。「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舊序二首／晉人樂曠多奇情、故其言語文章別是一色、世／……／其滯義明年以授梓五月既望、梓成、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嘗攷載記所述晉人話言、簡約玄澹爾雅有韻／……／憾焉耳矣刻成序之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褧撰」。（筆者案:此處的旁點「、」有兩種作用，一是作為斷句、句讀點之用，一是用於批點時強調重點，此處將句讀點維持原旁點「、」標示，批點符號則改以圓點「・」標示。）

【書序六】世說舊序舊跋與何氏語林舊序合刻，四周單邊，分上下二欄，上欄又分兩欄，下欄有界，每半葉九行十八字，版心花口（魚尾上刻書題），上刻「批點世說補」，約第六字高度刻單魚尾（第三、四葉為線魚尾，第六、七葉為黑魚尾），第七字高度刻「序」字，第十三、十四字字高度刻葉次「一（～四）」，匠刻體（明朝體），楷書，文章內容共計五葉，依序為「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宋臨川王義慶、采摭漢晉以來佳事佳話、為世／……／之法、右見高氏諱略」「右世說三十六篇世所傳釐為 10 卷或作四十／……／博紹興 8 年四月癸亥廣川董弅題」郡中舊有南史劉賓客集版皆廢于火世說亦／……／笠澤陸游書」「何氏語林舊序二首／何氏語林 30 卷吾友何元朗氏之所編類倣／……／無傳也辛亥四月之望文徵明書」華亭何元朗儗劉氏世說作語林成翰林待詔／……／以伺異者著之亦以曰作者之苦心云爾長洲／陸師道撰」。

【附釋名】四周單邊，分上下兩欄，下欄有界，半葉九行十八字，匠刻體（明朝體），楷書。版心花口，上刻「批點世說補」，第六字高度處刻單黑魚尾，第七字高度處刻「附」字，第十三字高度處刻葉次「一（～八）」，共八葉。「附釋名／郭泰字林宗（空一格）亦稱有道／……／（低一格）支法師（空一格）亦稱林道人（空一格）亦稱林法師（空一格）終（右側小字）」。

【凡例】（筆者案：僅國圖所藏原本（甲本）疑於裝訂時遺漏該篇凡例，其他修本、

遞修本、和刻本，於目錄之前皆附錄凡例十則）四周單邊，分上下二欄，下欄有界，半葉九行十八字，匠刻體（明朝體），楷書。版心白口，刻有「批點世說補凡例」，第十二字高度處刻有葉次「一（～二）」，共二葉。「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凡例十則／（低一格）一是書選次悉從瑯琊原本第瑯琊止錄正／（低二格）文而註未及也今以次補入／……」。

【目錄】四周單邊，分上下兩欄，下欄有界，半葉九行十八字，匠刻體（明朝體），楷書。版心花口，上刻「批點世說補」，第六字高度處刻單黑魚尾，第七、八字高度處刻「目錄」二字，第十三字高度處刻葉次「一（～三）」，共三葉。「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目錄／（低二格）卷之一／（低三格）德行上／……／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目錄終」。

【正文】卷首為「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一／（低八格）宋（空一格）劉義慶（空二格）撰／（低八格）梁（空一格）劉孝標（空二格）注／（低八格）宋（空一格）劉辰翁（空二格）批／（低八格）明（空一格）何良俊（空二格）增／（低十格）王世貞（空二格）刪定／（低十格）王世懋（空二格）批釋／（低十格）李（空一格）贄（空二格）批點／（低十格）張文柱（空二格）校注」。「（低二格）德行上／閔仲叔含菽飲水世稱節士老病家貧不能得／……」（筆者案：卷首正文首行「閔仲叔」為人名，右側標有豎線，因應論文橫書格式而以「底線」標示）。

（一）卷之一　德行上 共二十四葉

（二）卷之二　德行下 言語上 共二十葉

（三）卷之三　言語中 共二十八葉半

（四）卷之四　言語下 政事 文學上 共二十五葉

（五）卷之五　文學中 共二十四葉

（六）卷之六　文學下 方正上 共二十五葉

（七）卷之七　方正下 雅量上 共二十八葉

（八）卷之八　雅量下 識鑒 共二十七葉

（九）卷之九　賞譽上 共二十五葉

（十）卷之十　賞譽下 品藻上 共二十二葉

（十一）卷之十一　品藻下 規箴上 共二十四葉

（十二）卷之十二　規箴下 捷悟 夙惠 共二十八葉

（十三）卷之十三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共二十五葉

（十四）卷之十四　傷逝 棲逸 共二十四葉

（十五）卷之十五　賢媛 術解 共二十七葉

（十六）卷之十六　巧藝 寵禮 任誕上 共二十六葉

（十七）卷之十七　任誕下 簡傲 排調上 共二十八葉

（十八）卷之十八　排調下 輕詆上 共二十六葉

（十九）卷之十九　輕詆下 假譎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共三十二葉

（二十）卷之二十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共二十四葉

【版式】四周單邊，有界，分上下二欄，下欄半葉九行十八字，匠刻體（明朝體）。凡刊本版葉所記載之人名，皆於右側標有豎線。李卓吾批點或增補處則在該則上方標刻「補」字。該書葉面上欄版式不一，既有兩欄式亦有三欄式的樣式。版式特徵顯示，刊刻時對此類細節並無統一規範，各版面可能依刻工個人習慣操作，其間差異可為辨識刻工之線索。

【尾題】「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一」。

【跋文】四周單邊，無界，手書上板，半葉六行十三字，版心白口，無魚尾，第一到第四字高度處「世說新語補」，第六字高度處刻「後序」，第十字高度處刻葉次「一（～三）」，寫刻體，行楷，共計三葉。「題世說新語後／嘉靖中華亭何元朗氏雅以博洽／……／嫡可也是歲乙酉三月既望瑯／琊王泰亨識」。

【墨釘（墨格）[13]】總計一處，約三、四行寬，位於全書最末跋文結束之後，明刊本原本沒有墨釘，修本、遞修本則有墨釘。

[13] 筆者案：「墨釘」或「墨格」係指製版時因木材未經完全刨平而遺留於版面之痕跡，多見於書頁邊緣，此類細微痕紋，往往可作為版本識別與斷代之依據。

【全書組成】

	作者	內容	各本收錄狀況
1	焦竑序	〈世說補序〉 「瑯琊澹園焦竑撰書」	甲
2	陳文燭序	〈刻世說新語補序〉 「萬曆丙戌穌日沔陽陳文燭玉叔撰」	甲丙丁戊
3	王世貞序	〈世說新語補序〉 「嘉靖丙辰季夏琅琊王世貞譔　」 「秣陵蔡拱日書」	甲丙丁戊
4	王世懋序 識語	〈世說新語序〉 「萬曆庚辰秋吳郡王世懋譔」 「是歲乙酉初春世懋再識」	甲丙丁戊
5	劉應登序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舊序二首〉 「耘廬劉應登自書其端是為序」	甲乙丙丁戊
6	袁褧序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舊序二首〉 「嘉靖乙未歲立秋日也吳郡袁褧撰」	甲乙丙丁戊
7	董弇序	〈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 「紹興 8 年夏四月癸亥廣川董弇題」	甲乙丙丁戊
8	陸游序	〈世說舊題一首舊跋二首〉 「淳熙笠澤陸游書」	甲乙丙丁戊
9	文徵明序	〈何氏語林舊序二首〉 「辛亥四月之望文徵明書」	甲乙丙丁戊
10	陸師道序	〈何氏語林舊序二首〉 「長洲陸師道撰」	甲乙丙丁戊

11	附釋名		甲乙丙丁戊
12	凡例		乙丙丁戊
13	目錄		甲乙丙丁戊
14	正文		甲乙兵丁戊
15	王泰亨跋	〈題世說新語補後〉 「乙酉春二月既望琅琊王泰亨識」	甲乙丙丁戊
16	刊記	和刻本	丁
17	碕允明序	〈重刻世說新語補跋〉 「皇和安永己亥二月守山碕允明謹按」	戊

（二）丙本：遞修本・明萬曆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服部文庫藏）

丙本屬於「遞修本」，其最顯著的書誌特徵在於內含「明刊本」的原刻書板印刷，同時夾雜「江戶時期」的「補鈔」「補配」。現存丙本中的三葉「補鈔」「補配」，前人研究未曾深入探討，包括卷之一第二十二葉、卷之二第十四葉、卷之三第六葉，均非原始明刊本內容，而屬於江戶時期補配增補。從書物形態觀察，補鈔補配的版面相較於明刊本略小約 0.2 公分，排版仍維持上下兩欄，但下欄的格式與明刊本不同，無界行。此外，字體特徵異於明刊本，與江戶時期和鈔本、和刻本漢籍的字體風格相近，筆畫波磔不明顯，更接近六朝時期的小楷風格。至於補鈔補配的具體時間，依現存書物證據尚難確定，僅能推測可能出自江戶時期服部家藏者的整理與增補，極有可能是在書籍傳入江戶日本後，由收藏家根據佚失內容參照其他版本補鈔補配而成。

（三）丁本：覆刻本・和刻本A・元祿7年京都文會堂刊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雲英文庫藏）

丁本為和刻本，現有研究尚未確定其所依據的刊刻底本。全書共20卷，從版刻特徵觀察，可明顯區分並歸納出兩種風格迥異的明朝體雕版文字。第一種風格的字體與原刻本之明朝體存有明顯差異，字形較為方正，字距緊密，甚至在某些頁面出現過度擁擠的現象，導致版面布局不佳，訓點符號亦偏小且排列凌亂。相較之下，第二種風格的字體則較為接近原刻本之明朝體，字形略呈長方形，字距較為疏朗，使得整體版面佈局較為均衡。

（四）戊本：重刻本・覆刻修印本・和刻本B・安永8年京都文會堂據元祿9年修印本重校勘（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土歧文庫藏）

嚴格而言，戊本可再區分為兩個版本，即安永年間刊行的兩種不同版本。其中一種為本文所據之土歧文庫藏本，本文稱之為「安永本A」。該本在雕版技術與筆耕漢字書寫掌握上，較和刻本丁本明顯更為精良，印刷品質亦遠勝於丁本。從其雕版字樣特徵觀察，可大致歸納出四種不同風格：第一種風格的字體相較於其他類型較大且方正，用筆力道厚重，筆畫粗實，字距較為緊密；第二種風格的字體接近正方形，且每一筆豎畫（包括垂露、懸針、豎鉤）均刻意加重筆畫，呈現出豎畫特別粗重的視覺效果；第三種風格則相對較為生澀，雖然是覆刻明朝體，但在筆法掌握上明顯生疏，導致字形結構僵硬，整體組成略顯拙劣；第四種風格則為全書中最為成熟者，字形與原刊本的明朝體最為接近，顯示筆耕與雕刻技術皆趨於完善。

至於戊本系統的第二種版本，即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本文稱之為「安永本B」，其正文內容與安永本A相同，但在書籍結構上有所差異。最顯著的變動在於，原本附錄於全書末尾的王泰亨跋文被移至書前，併入書序部分，使得書序排列順序變更為「王世貞→王世懋→陳文燭→王泰亨」。值得注意的是，王泰亨跋文改為書序後，其版心亦經過重新刻製，改為白口格式，並於不同字位處標示相關題名：第一至第四字高度刻有「世說新語補」，第六字高度刻有「後序」，第十字高

度則標示「一～（三）」等卷次標記。

三、雕版字樣學與各版本間的補刻、覆刻（翻刻）特徵

（一）絕非「千篇一手」的「明朝體」

承續前文所述之書誌特徵，李卓吾批點本的字體風格悉為「明朝體」。所謂「明朝體」，乃中國明代（1368-1644）因應木刻印刷技術發展而逐步成形的一種印刷字體，其字體演變最早可見於臨安書坊對仿宋本之覆刻，在此過程中，「宋朝體」的筆畫逐漸產生變化，線條趨於剛硬且稜角分明，特別是在豎畫與橫畫的銜接轉折處及筆畫收結之處，往往呈現顯著的三角形結構。

整體而言，「明朝體」的橫畫右端收結處，以及轉折（使轉）或筆畫銜接處之右側，皆固定呈現三角形，形成明顯的辨識特徵。此一細節在日文字形學中被稱為「ウロコ」（鱗），筆畫粗細變化顯著，易於識別字形。至嘉靖 32 年（1553）刊印之《墨子》，明朝體之基本形式已大致確立；至萬曆年間（1573-1619），隨著刊本數量激增，明朝體遂成為明代刻書普遍採用之「匠體字」。其中，刊刻精美且極具代表性的明朝體範例包括南京國子監刊本（金陵本）、嘉興楞嚴寺刊本、鄭藩刊本（鄭藩本）及毛晉汲古閣刊本（毛本、汲古閣本）等，皆為明代書籍印刷之經典典範。

「南京國子監刊本（金陵本）」：[14]國子監自隋代以來即為中國歷代王朝於都城（如長安、洛陽、開封、南京等）設立的最高學府。唐代國子監設有長官祭酒、次官司業等職，至明代則分設南京與北京兩座國子監。南京國子監刊行的書籍版本，被稱為「南監本」，其字體風格具有獨特的「明朝體」特徵。相較於其他刻本，南監本的字形略呈長方形，且凡由左右兩部件組成的字，其右側部件顯得相對寬大。此

[14] 〔日〕今田欣一著，Eric Liu、Metaphox 譯：〈宋朝體與明朝體的流變——漢字字體歷史〉，特輯：活字字體的基礎講座（活字書體の基礎講座），《欣喜堂》網站，網址：https://www.thetype.com/kinkido/kinkido-3/zh-hant/（2025 年 2 月 3 日上網）。

外，右側筆畫亦刻意加粗加重，使整體字形更具穩重感。除了常見的厚實豎畫與橫畫收筆呈現三角形外，南監本的捺筆波磔尤為顯著，而鉤（趯）筆的收筆則固定刻寫為厚實且接近正三角形的結構。此一字體風格，對於後世「金陵」一帶書坊的刻書實踐影響深遠，成為後來書籍刊刻字樣仿效的經典範例（見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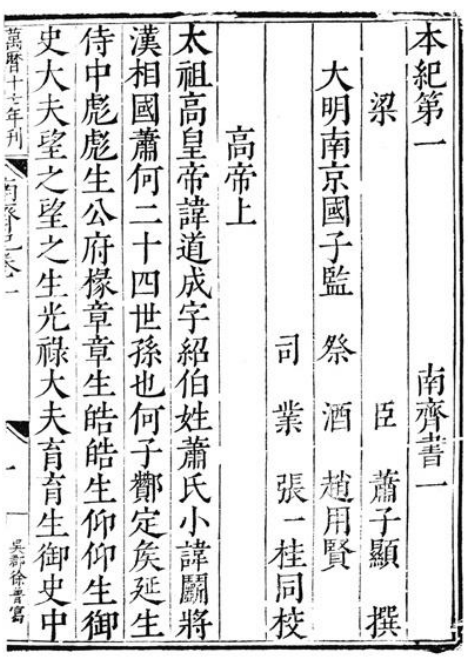

本紀第一　南齊書一
梁　臣蕭子顯　撰
大明南京國子監　祭酒　趙用賢
司業　張一桂同校
高帝上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小諱鬬將
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何子酇定侯延生
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
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
萬曆十七年刊
吳郡徐書寫

圖 2　南京國子監版本（金陵）・《南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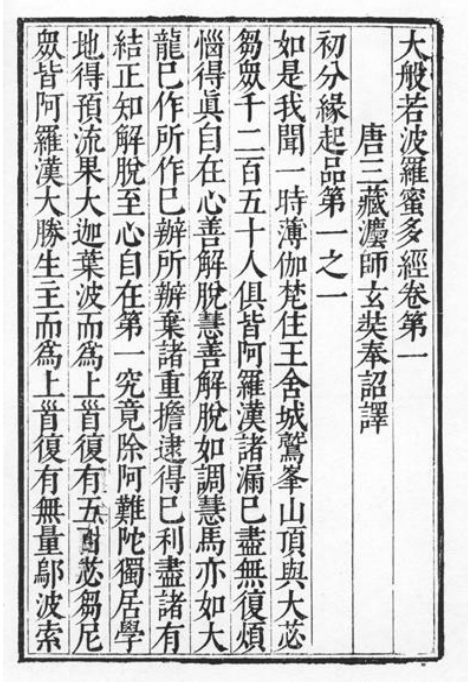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
唐三藏沙門玄奘奉詔譯
初分緣起品第一之一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王舍城鷲峯山頂與大苾
芻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阿羅漢諸漏已盡無復煩
惱得眞自在心善解脫慧善解脫如調慧馬亦如大
龍已作所作已辦所辦棄諸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
結正知解脫至心自在第一究竟除阿難陀獨居學
地得預流果大迦葉波而爲上首復有五百苾芻尼
衆皆阿羅漢大勝生主而爲上首復有無量鄔波索

圖 3　楞嚴寺刊本（嘉興）・《嘉興藏》

「楞嚴寺刊本（《嘉興藏》）」：[15]《大藏經》以經藏、律藏、論藏三藏為核心，加上相關注釋書籍，簡稱為《藏經》或《一切經》。《大藏經》是包羅佛教經典的大部頭著作，自宋代以後頻繁地作為國家事業不斷出版翻刻。明代的出版歷程包括太祖時期南京南藏，成祖時期北京北藏，隨後還有武林藏、嘉興藏，但其中始於 1589 年（萬曆 17 年）的《嘉興藏》被普遍認為是明代版本的《大藏經》的代表，因其方冊形式易於閱讀而被廣泛採用。另外，該本的字樣風格相較於前述的國子監本，字形

[15] 陳玉女：《明清嘉興楞嚴寺《嘉興藏》之刊印與其海內外流通》，《佛光學報》新 6 卷第 1 期（2020 年 1 月），頁 123-204。

更為細長，雕板時字距極密，除了波磔、趯筆之外，豎畫、反捺都加重加粗，但在單一文字的間架結構上，空間分配明顯平均。其後，宇治黃檗宗萬福寺的《鐵眼版一切經》（1678）也以此本作為刊刻底本（見圖 3）。

「鄭藩刊本（鄭藩本、鳳翔體）」：明代地方除中央機構外，藩王亦積極參與官方刻印。雖受政軍約制，然因財力充裕、具地方影響力，得以延攬文士與工匠，所刻書籍在編校與印製層面多呈高水準。其中，鄭藩世子朱載堉（1536-？）所刊行的音樂著作《樂律全書》被認為是藩刻本中的代表作之一，此本除通稱「鄭藩刊本」或「鄭藩本」外，其雕版字樣風格亦稱「鳳翔體」，特徵為字形近方正、結構均衡、筆畫粗細一致，無明顯波磔與稜角，整體差異度低而非右側較寬大，風格趨於整齊劃一（見圖 4）。

「毛晉汲古閣刊本（毛本、汲古閣本）」：[16]明末清初的代表藏書家和刻書家毛晉（1599-1659）刊行了各種不同版本典籍（包含仿宋體、元朝體）和明朝體字樣的書籍。於某個時期開始，汲古閣本採用了字形略顯「長體」「扁平」的明朝體，最具代表性者是毛晉汲古閣的《宋名家詞》，此類扁平風格的字體為藏書家與刻書家所推崇，逐漸發展出橫豎筆畫對比強烈、筆勢輕重有別、短撇（掠）呈肥厚三角形、部件銜接緊密等特徵，成為明朝體定型的重要原型（見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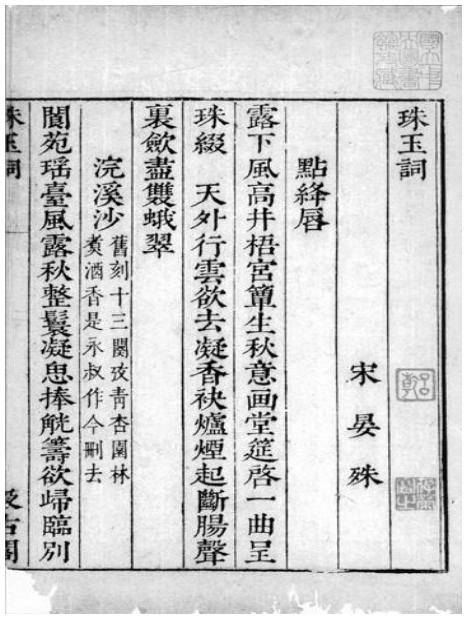
16 葉淑慧：〈存散與流傳：明清毛晉汲古閣刊刻《六十種曲》及其現存版本探析〉，發表於「首屆兩岸四地宮廷戲曲研究論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故宮博物院主辦，會議日期：2015 年 11 月 10 日-11 日）。周彥文：《毛晉汲古閣刻書考》（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年）。〔日〕戶川芳郎著，廖明飛譯：〈毛本《十三經注疏》的九篇序——新獲《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書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4 卷第 2 期（2014 年 6 月），頁 163-171。

律學新說序

鄭世子 匡載堉謹撰

度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夫度書一卷之中致意於律者三焉此王政之大端律呂之本原也三代以來其道大備而周禮載之爲詳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古之聖人推律以制器因器以宣聲和聲以成音比音而爲樂然則律呂之用其樂之本歟歷代羣儒言律呂者不過四法一曰長短之形二曰容受之積三曰審音四曰候氣以理論之長短之形律之本也是故有定形而後有容受之積有眞積而後發中和之音有正音而後感天地之氣傳曰物有本末

圖 4　鄭藩刊本（鄭藩本、鳳翔體）·《樂律全書》


珠玉詞

宋 晏 殊

點絳脣

露下風高井梧宮簟生秋意画堂筵啓一曲呈珠綴　天外行雲欲去凝香袂爐煙起斷腸聲裏斂盡雙蛾翠

浣溪沙 舊刻十三闕攷青杏園林羨酒香是永叔作今刪去

閬苑瑤臺風露秋整鬟凝恩捧觥籌欲歸臨別

圖 5　毛晉汲古閣刊本（毛本、汲古閣本）·《宋名家詞》

綜上所述，「明朝體」雖為明刊本所用之印刷體，然其概念與今日所稱印刷體不同，因雕版字樣出自工匠手書，筆工（版下清書、筆耕）風格差異亦如實反映於刻工之中，遂成版本判別之重要依據。本文擬以「雕版字樣學」方法，檢視《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之原刊本、遞修本與和刻本間之關係，並進一步比對字樣，探討元祿本之底本來源，以釐清其版本系統與文本源流。

（二）雕版字樣鑑定與「修」「刊」「印」次序之再檢討

稻田篤信曾於〈和刻本『世說新語補』の書入三種〉[17]一文中指出，元祿和刻本所據底本迄無定論，其判斷多依書序次第、焦竑序文等文獻異同為據，然原刊本（甲本）與和刻本（丁本、戊本）之繼承關係，至今仍存疑義。

本文由「雕版字樣風格」入手，依據既有文獻學成果，透過字樣比對，探討元

[17] 〔日〕稻田篤信：〈和刻本『世說新語補』の書入三種〉，頁 1-17。

祿和刻本之可能底本。具體將比較下列四組版本的雕版特徵：（1）甲本與丁本、（2）甲本與戊本、（3）丙本與丁本、（4）甲本與丙本。藉由對雕版字樣的細緻比對與分析，重新審視《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明刊本與和刻本五種版本系統之間「修」「刊」「印」的關係，進一步檢證其版本演變的脈絡。

（1）甲本（原刊本）與丁本（和刻本 A）

檢視江戶時期和刻本的覆刻流程大致如下：原稿首先由「版下清書」筆工以極薄紙覆於底本搨寫內容，供「雕版師」逐字雕刻木板。若底本印數充足且紙質透光，則可逕以底本雕刻，省略搨寫。雕版完成後，由「摺師」手工印刷，再經「表紙屋」裝訂封面與內頁，始得成書。

覆刻（翻刻）版本因依據同一底本刊行，傳統上被視為「同一版本」，然雕版印刷時代所謂「同一」，實則僅指內容一致，並不涵蓋字跡形式的一致性。由於版下清書由不同筆耕者執筆，即便臨摹亦難免筆跡差異。為檢視此類細部差異，本文引入圖像識別技術（Image Recognition Technology），[18]透過人工智慧（AI）進行字形比對與圖像疊合（Image Superimposition，係透過色彩、透明度與對比度等參數調整，實現字形的精準對位），以精準對位雕版字樣，輔助版本辨識（見圖 6），進而為雕版書誌研究提供更嚴謹的證據基礎。

透過圖像識別技術的應用與輔助，可以清晰識別雕版字樣的細微差異。例如圖 7，在卷 1 第六葉第二行第六字「江」，甲本與丁本在右側「氵」部的三點水筆畫明顯不同——甲本的三點水佈局較為開展，筆劃形態圓潤，而丁本的三點水則更為內斂，筆劃略顯細瘦且角度有所偏斜。再如，同一行第七字「夏」，甲本文字筆形較為寬博，特別是下方兩撇的收結處相連，而丁本的「夏」字則呈現出細長形態，下方部件的上撇較短，而下撇則更為舒展。此外，在同一行第十二字「公」，甲本「公」

[18] 王海暉等：《圖像分析與識別新技術研究與應用》（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 年）。李闔廷、鄭國明：〈影像辨識之物件形狀分析技術探討〉，收入社團法人台灣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編：《2023 第十九屆科技教育研究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2023 第十二屆工程、技術與 STEM 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2023 年），頁 811-826。

字字形寬大，尤其右側捺筆顯著修長，而丁本的「公」字則相對狹小，且右側捺筆僅有甲本相應筆畫的一半長度。

這些細節變化顯示，甲本與丁本的雕版字樣雖在整體風格上保持高度一致，然在單字筆畫的具體細節上卻呈現出顯著差異。這一現象一方面印證原刊本（甲本）並非和刻本（丁本）的直接刊刻底本；另一方面，這種現象也進一步揭示出，丁本在刻版時極可能參照了一個字形風格與甲本接近、但並非完全相同的底本。這一底本的存在，使得丁本作為逐字覆寫翻刻的覆刻本，在整體版面上與甲本高度相似，卻又在筆畫細節處展現出獨特的雕版特徵。由此可見，透過圖像識別技術的精密分析，得以更細緻地辨識雕版書寫痕跡，進一步深化對明刊本與江戶和刻本之間版本關係的理解。

```
import cv2
from google.colab.patches import cv2_imshow

# 讀取第一張圖像
image1_path = "/content/drive/MyDrive/図1.png"   # 替換成第一張圖像的路徑
image1 = cv2.imread(image1_path)

# 讀取第二張圖像
image2_path = "/content/drive/MyDrive/図2.png"   # 替換成第二張圖像的路徑
image2 = cv2.imread(image2_path)

# 確保兩張圖像尺寸相同，如果不同，可以使用cv2.resize調整尺寸
if image1.shape != image2.shape:
    image2 = cv2.resize(image2, (image1.shape[1], image1.shape[0]))

# 將第一張圖像變成紅色
image1_red = image1.copy()
image1_red[:, :, 0] = 0   # 清除綠色通道
image1_red[:, :, 1] = 0   # 清除藍色通道

# 將第二張圖像變成藍色
image2_blue = image2.copy()
image2_blue[:, :, 1] = 0   # 清除綠色通道
image2_blue[:, :, 2] = 0   # 清除紅色通道

# 進行圖像疊合
alpha = 0.5   # 這控制兩張圖像的疊合程度，0.0表示完全透明，1.0表示完全不透明
```

圖 6　「圖像識別技術」程式編寫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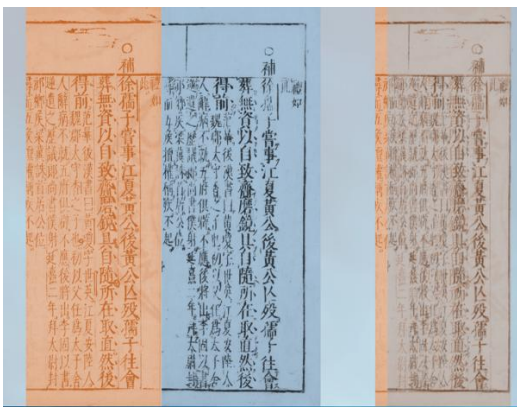


圖 7　甲本（原刊本）與丁本（和刻本 A）圖像疊合比較

（2）甲本（原刊本）與戊本（和刻本 B）

將甲本與戊本相互對照後可發現，兩者之間的字樣相似度遠高於甲本與丁本的比較結果。在筆畫長短、書寫風格及整體書法特徵上，戊本與甲本高度近似。然而，由於不同的筆耕者在覆寫過程中仍會自然地留下個人書寫習慣，即便是逐字摹寫，仍可能在筆畫的間架結構、角度、筆勢收結、筆畫高度與位置等方面產生極為細微的差異。

例如圖 8，在卷之一第六葉第二行，第十二字「公」字，戊本右側捺筆的彎曲幅度顯著大於甲本，使整體筆勢略顯圓潤；第十四字「歿」字，戊本左側部首「歹」的長撇較甲本稍長，而右側「又」部的收筆則略短於甲本；第十五字「孺」字，戊本右側「需」部的筆畫結構較甲本更為緊密，因此下方「而」字的字形略顯縮小。這些極為細緻的雕版筆畫變化，雖然在肉眼觀察下不易察覺，但透過精確的字樣對比與分析，仍能揭示筆耕者在翻刻過程中所留下的細微差異。

正是這些細節差異，進一步證實「戊本為甲本覆刻本」之推論。儘管書前附錄的書序存在差異，然而在正文部分，戊本的漢文內容與字樣明顯依照甲本刻成，再於其上添加訓讀符號。換言之，甲本可確立為戊本的正文漢文刊刻底本，而具備訓讀內容的丁本則可能是戊本漢文訓讀符號（乎古止點、雁點、返點、送假名、振假名）之刊刻依據底本。由此可見，透過雕版字樣的細緻比較與圖像識別技術的輔助分析，得以更為精確地勾勒明刊本與江戶和刻本間的版本繼承關係，進一步深化對其刊刻脈絡與文本傳播方式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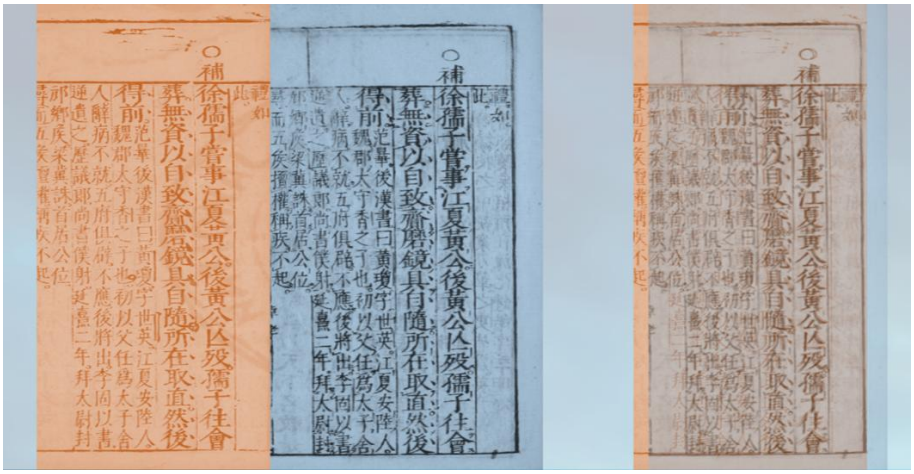


圖 8　甲本（原刊本）與戊本（和刻本 B）圖像疊合比較

（3）丙本（遞修本）與丁本（和刻本 A）

在本研究的觀察中，筆者注意到原刊本（甲本）與修本（乙本）在正文內容上

幾乎完全一致，然而，甲本與遞修本（丙本）之間的字樣卻存在諸多筆畫差異。更值得關注的是，遞修本（丙本）的字樣特徵明顯與和刻本（丁本）高度相似，顯示出其版本繼承上的特殊關聯性。為了進一步驗證這一現象，本文同樣選取第六葉，透過顏色與透明度調整技術，將丙本與丁本的雕版字樣進行座標疊合分析。比對結果顯示，兩者的文字筆畫幾乎完全重疊，僅在極為細微的筆畫細節上存在差異。例如圖 9:第二行第七字「夏」,丁本的右側筆畫略短;第三行第十五字「取」,丁本「又」部的長撇書寫位置稍高。這些細節變異雖然微小，卻恰恰反映雕版覆寫過程中的筆跡特徵變化。

和刻本（丁本）的正文漢文文本內容雖然與原刊本（甲本）相同，但其字樣筆畫卻與遞修本（丙本）高度一致，而與甲本存在一定落差。這一現象顯示，丁本所依據的底本極可能並非直接來自原刊本，而是原刊本的遞修本（丙本）。由於遞修過程涉及筆耕者的重新覆寫，書法風格與寫字習慣隨之產生細微變化，從而導致和刻本（丁本）在翻刻過程中，亦因底本的變化而呈現出字樣間的落差與殊異。這一發現不僅有助於釐清和刻本丁本的刊刻來源，更進一步說明了原刊、遞修與和刻之間的版本流變與雕版傳承關係。

（4）甲本（原刊本）與丙本（遞修本）

進一步將原刊本（甲本）與遞修本（丙本）進行圖像疊合與筆畫細部比較，可以發現，雖然整體版面文字仍維持高度一致，但在筆畫角度、結構分佈與細部筆勢方面，丙本相較於甲本已開始產生極為細微的偏移。這種變異在局部筆畫上尤為顯著，例如圖 10：第二行第八字「黃」: 丙本的「廿」部整體偏向右傾，筆畫間距較甲本略微收縮，使整個字形顯得較為緊湊。第二行第九字「公」: 丙本的「八」部筆勢更為內斂，兩撇的分佈角度較甲本更趨向於對稱，而甲本則稍顯開展，左右撇筆角度更為分離。第二行第十字「後」: 丙本「彳」部的左側豎筆較甲本略長，且整體佈局略微向左偏移，使得「後」字的結構相較甲本更加緊密。

筆耕者於覆寫過程中雖逐字臨摹原刊本，然其書寫習慣仍不可避免地影響字形結構與筆勢，致使雕版字樣產生細部偏移。此偏移歷經遞修累積，至丙本再為丁本

之刊刻底本時，字形風格變異益加顯著，亦因此可見丁本與原刊本（甲本）之間存有明顯差異。由此可見，自原刊經遞修至翻刻的傳承歷程中，筆耕者書寫特徵的累積成為雕版字樣風格變異的關鍵因素。此一變化不僅呈現版本流變的軌跡，亦為版本鑑定提供重要依據。藉由圖像疊合技術進行字樣比對與系統分析，可更精確重建明刊與江戶和刻本間的傳承脈絡，並釐清文本遞修與雕版工藝所致之形貌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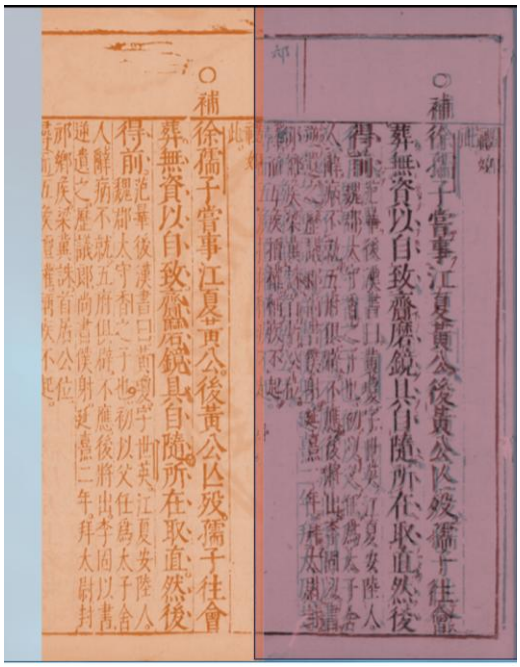


圖 9　丙本（遞修本）與丁本（和刻本 A）圖像疊合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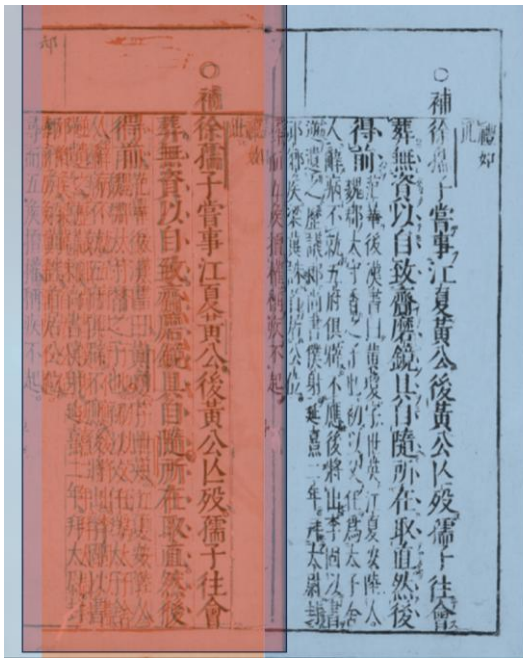


圖 10　甲本（原刊本）與丙本（遞修本）圖像疊合比較

綰合上述考證內容，於是，此處可將先前所述的明刊本與和刻本之間的版本相續關係，重新梳理、訂正並歸結如下（見圖 11）：

1、原刊本（初刻本）（後印本）・明萬曆 14 年刊本（臺灣國家圖書館藏）・甲本

2、修本・書林余圯儒刊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乙本

3、遞修本・明萬曆刻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服部文庫藏）・丙本

4、（正文文字內容根據遞修本）－覆刻本・和刻本 A・元祿 7 年京都文會堂刊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雲英文庫藏）・丁本

5、（正文內容根據原刊本）－重刻本・覆刻修印本・和刻本 B・安永 8 年京都文會堂據元祿 9 年修印本重校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土歧文庫藏）・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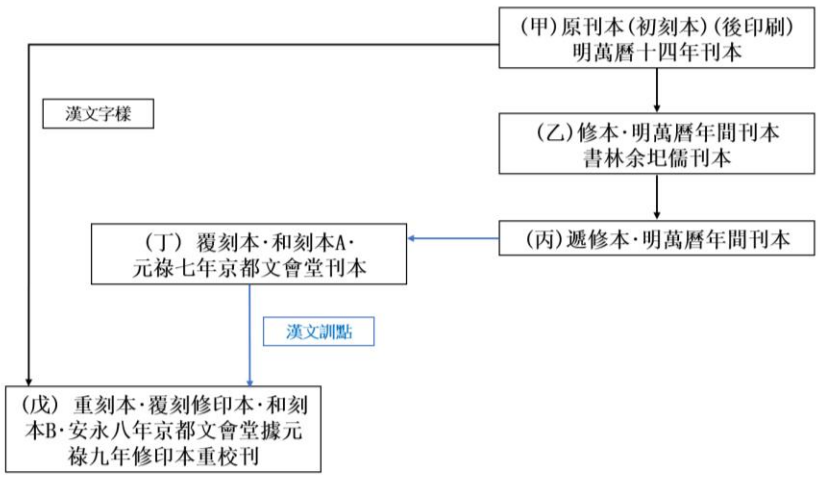


圖 11　「校正版」《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明刊本－和刻本）五種版本系統「修」「刊」「印」關係圖（II）

（資料來源：本表係根據臺灣與日本各地圖書館所藏《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之序文、封面、刊記等出版資訊，經筆者實地查勘各版本全書內容，考證並比對其間諸版本之雕版字樣後，重新整理歸納並繪製而成。）

逐一比對甲本、乙本、丙本、丁本與戊本的雕版筆畫後，可以觀察到以下幾點關鍵特徵：首先，乙本作為甲本的修訂本，其文本內容幾乎與甲本一致，字樣風格亦保持高度相似，僅在部分筆畫、標點與結構安排上略有修正，顯示其刊刻目的是基於甲本進行小幅調整，而非完全重製。其次，丙本作為遞修本，相較於甲本開始出現更明顯的筆畫變異，特別是在筆勢角度、結構分佈與細部筆畫收結處，顯示出筆耕者在覆寫時已逐步融入自身書寫習慣，導致雕版字樣與原刊本逐漸產生差異。再者，丁本（和刻本 A）的雕版字樣與丙本高度重疊，顯示其刊刻底本來自遞修本（丙本），而非直接取自原刊本（甲本），這一點與其字樣筆畫的微妙偏移相互印證。此外，戊本（和刻本 B）雖然在書序編排上有所不同，但其正文漢文字樣與甲本極為接近，證實其刊刻底本直接依據原刊本（甲本）進行翻刻，而非經過丙本的遞修

過程。最後，圖像疊合技術進一步顯示，在雕版字樣筆畫的細節層面，和刻本丁本與丙本的筆畫特徵高度一致，與甲本相比則存在更明顯的筆畫變異；相對地，戊本與甲本的筆畫風格則更加接近，進一步支持了戊本直接承襲甲本的推論。

上述研究結果清楚地揭示了明刊本與江戶和刻本之間的刊刻脈絡與版本繼承關係。從原刊（甲本）到修訂（乙本），再到遞修（丙本），雕版字樣在筆耕者的覆寫過程中逐漸產生細微變異，而這種變異進一步影響了後續的和刻本刊刻：和刻本丁本（A）承襲遞修本（丙本），而和刻本戊本（B）則直接承襲原刊本（甲本）。這一現象不僅反映出雕版工藝中筆耕者對字樣的影響，也進一步證明了版本傳承過程中，書寫習慣與筆畫變異對刊刻系統的影響。透過雕版字樣比較與圖像識別技術的輔助分析，本研究精確揭示了不同版本間的細微變異與刊刻依據，進一步深化了對《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在明代與江戶時期刊刻流變的理解，並為版本學、書誌學與雕版印刷技術研究提供了更為細緻的學術依據。

四、《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之字樣筆跡鑑定與版下清書（筆耕）書蹟辨析

延續前文所述，有關明清與江戶時期出版品的製作（製本）流程，在雕版刻印完成後、正式印製並交付「本屋」（即負責銷售與流通的書肆）進行販售之前，實際上還涉及一系列極為嚴謹且精細的工藝環節，而這些環節與各類專業職人（工匠）的技藝息息相關。首先，手稿初稿的製作，往往由學者或抄錄者整理出草稿後，交予專門負責「版下清書」的筆耕（筆工），由其使用極薄的紙張覆於底本之上，進行摹寫與整理，使之適合雕版使用。筆工的書寫風格與字體端正程度，將直接影響最終雕版字樣的視覺效果，因此筆耕工在出版流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其次，雕版環節則由專業的「雕版師」負責，他們以筆耕清書後的稿件為基礎，在木板上逐字雕刻，每一筆畫皆需精細入微，確保字跡工整且清晰可辨。雕版技術

的高低，將直接決定最終印刷品的品質，尤其是繁複字樣的處理、筆畫的銜接流暢度，以及雕刻深淺的拿捏，都需要高度專業的工藝技巧。部分雕版師甚至會在書頁邊角留下獨特的刻工標記，以作為工坊內部的識別方式。

當雕版製作完成後，則進入印刷與裝訂階段。此時，由專門的「摺師」（印刷師）負責手工逐葉印刷，他們透過熟練的技術，確保墨色均勻、字跡清晰，並且避免印刷過程中的墨跡模糊、重影或滲墨等問題。印刷完成後，尚需經過「表紙屋」進行裝訂，這包括書頁的折疊、拼接、封面設計與裝潢等細節。裝訂工藝的選擇，通常取決於書籍的用途與市場定位，例如一般書籍可能採用較為簡單的線裝方式，而貴重的收藏用書則可能會選用更加精美的包背裝訂，甚至使用染色封面與金箔裝飾，以提升書籍的質感與價值。[19]

在整個出版流程中，各技術環節的職人皆依據自身所負責的工作比例獲取相應的工資報酬。然而，與作者、編輯者、校閱者及書商等角色相比，這些技術工匠的名字往往未被記載於書籍的刊記與版權頁上，導致其貢獻長期隱於歷史之中。書籍的封面、書首、刊記頁面，通常僅標明著書籍的作者、編輯者、校閱者，以及負責銷售的本屋資訊，而雕版師、筆耕、摺師、裝訂工等職人的姓名則幾乎不見於正式記錄，彷彿成為出版史上的無名功臣。[20]這種情況，亦反映出傳統出版體系中技術工匠的隱形性，雖然他們在書籍生產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卻鮮少受到關注與讚譽。

職是，本文將針對《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的版本演變過程中，雕版狀況較為複雜的遞修本（丙本）、和刻本 A（丁本）、和刻本 B（戊本），進行詳細的版本比較與書法風格分析。本研究將透過筆跡鑑定的視角，探討各卷字樣風格的異同，分析其筆畫結構、書法特徵與刻工風格，並嘗試推測各版本之間的繼承關係與刊刻源

19 〔日〕藤本幸夫編：《書物・印刷・本屋——日中韓をめぐる本の文化史》（東京：勉誠出版社，2021年）。

20 檢視中國明清時代出版、生產的古籍，著名且暢銷的出版品，例如：明代的《楊升庵先生批點文心雕龍音註》第六版的版心下方，載有版木的雕版師名姓「梅子庾、鄧、李」，但是，被刻載全名（姓氏與名號）者，僅有書坊經營者梅氏一人而已。一般而言，製版工匠的個人資訊多未被記錄。林玟君：《楊慎「六朝學」研究——兼論江戶時代荻生徂徠的容受》，頁 137-139。

流。傳統的版本學研究，多半依據書序排列、刊記內容、紙張與墨色特徵等文獻線索，來推測不同版本之間的關係。然而，雕版書籍的刊刻過程中，不同筆耕的參與，往往會在字跡特徵上留下細微但可辨識的筆畫風格。即便是覆刻（翻刻）版本，由於筆耕的個人書寫習慣，使得文字筆劃的收放、字形結構的間架比例、筆畫長短與角度等細節，仍可能出現細微差異，這些特徵可作為判定不同版本刊刻依據的重要依據。

本文嘗試結合雕版印刷的實務層面，針對《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五個主要版本系統中的丙本、丁本、戊本，進行雕版字樣的詳細比對，透過筆畫偏移、字形變化與結構差異，檢視不同版本間的書寫風格與刻工技藝的異同，藉此推測其刊刻源流與刻工風格之承襲與變異，期望藉由筆跡鑑定與雕版技術分析，釐清明刊本與和刻本之間的刻工風格與版本承繼脈絡，並從書籍製作技術與出版實務的角度，探討從明代至江戶時期的書籍刊刻機制與書法風格之流變，進一步提出既往研究所未觸及之新方法與新解釋，以深化對東亞雕版印刷文化與古籍版本學的理解。

（一）筆跡鑑定與雕版字樣

人們的書寫方式，是長期學習與實踐所積累的結果，因此，每位書寫者在不知不覺間，會逐漸發展出獨特的書寫習慣，並透過筆劃運行、字形結構與書寫節奏等細節，體現於其筆跡之中。此種因個人習慣所產生的書寫特徵，學界通常稱之為「筆跡個性」（individuality of handwriting）。[21]在書寫學習的初期，受限於臨摹與教師指導，學習者往往會依循所學字體的標準範式，包括筆劃組成、結構比例與形態風格等，因而筆跡個性尚未固定，仍處於模仿與仿效階段。然而，隨著年歲增長與書寫經驗的累積，每個人的筆跡將逐漸發展出獨特風格，不論是筆畫的輕重、運筆的節奏、轉折的處理，抑或字形間架的佈局，均會逐步展現出個體化特徵，形成穩定且可識別的「筆跡個性」。

[21] 張彥卿：《漢字筆跡與人格及心理健康關係之初探》（新北：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2018 年）。翁淑緣：〈漢字筆跡與人格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44 期（2016 年 9 月），頁 77-97。王成章、馬少堯：〈筆跡個性鑑定〉，《憲兵學術季刊》第 43 期（1998 年 11 月），頁 62-68。

這種筆跡個性的發展，對於書跡鑑定（palaeography）與筆跡學（graphology）而言，具有極為關鍵的參考價值。筆跡鑑定主要依據個人書寫習慣的累積與變異，透過筆法（brush technique）、字形（character form）、結構（composition）、筆畫運行模式（stroke movement pattern）、行氣（flow of writing）等因素，分析不同書寫者的風格異同，進而判斷書蹟的真偽與作者身份。[22]在東亞書法傳統中，這類筆跡特徵的穩定性，與書法家自幼習熟「筆法字學」的長期訓練密不可分。[23]

對應於書法史與古籍版本學的研究，筆跡個性即所謂「書法風格」（calligraphic style）或「書風」（script style），其形成與演變不僅受個人書寫習慣影響，亦受到時代書風、地域流派、刻工技藝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例如，在古籍雕版印刷的過程中，筆耕的個人書寫習慣，往往會自然地反映在字體筆劃的長短、字形結構的佈局、筆勢轉折的處理等細節上，即便是覆刻（翻刻）過程中試圖忠實臨摹原本，仍難以完全消弭這些細微差異，這些特徵正是書跡鑑定與版本源流研究的重要依據。

綜合而言，「筆跡個性」的發展乃是書寫者長期積累的結果，而書跡鑑定正是透過觀察這些書寫特徵的個體化差異，來分析筆跡的時代風格與書寫者特徵。在古籍版本學的研究中，這類筆跡分析方法，能夠為版本源流與刊刻技術的考察提供更精確的實證依據，進一步深化我們對東亞書籍文化與雕版印刷技藝的理解。

傳統書學所強調的「筆法字學」，則可從以下兩則文獻中理解：

> 鄭子經云：「偶寫一字不成，須於眾碑中求之，不可輕易率然而作，趙子昂所謂必求古人佳樣是也。」[24]

> 《宋史長編》：「太宗每暇日問王著以筆法，葛端以字學。筆法，臨摹古帖也；字學，考究篆意也。筆法與字學本一塗而分歧，晉唐以來，妙於筆法而不通

[22] 陳用佛：〈遺囑筆跡鑑定〉，《警專論壇》第 5 卷（2012 年 12 月），頁 57-61。陳虎生：〈筆跡鑑定的探討〉，《警學叢刊》第 26 卷第 5 期（1996 年 3 月），頁 17-29。詹明華、陳弘斌、陳炯廷：〈模仿筆跡之鑑定〉，《中央警察大學學報》第 39 期（2002 年 4 月），頁 427-446。

[23] 林玟君：《楊慎「六朝學」研究——兼論江戶時代荻生徂徠的容受》，頁 183-188。

[24] 明・楊慎撰、清・李調元校定：《墨池瑣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古籍庫館藏，光緒 7 年〔1881〕8 月《函海》本），卷 1，葉 1a-b。

字學者多矣。」[25]

隨著書寫者年齡的增長與書法技藝的鍛鍊，用筆方式漸趨成熟，其筆劃運行、結構佈局與書寫節奏逐步穩定，從而形成獨特且穩固的「筆跡個性」。這種個性化特徵，既表現在筆勢的輕重疾徐、字形的欹正收放，也體現在筆畫轉折的處理與線條的剛柔對比，使得不同書者的筆跡各具風貌，極難完全相同。

書法史上，筆跡個性的穩定性，為書跡鑑定提供了關鍵依據。例如，某甲之筆跡豐腴多筋，運筆渾厚圓勁；某乙之筆勢方正嚴謹，結構工穩平正；某丙之書風則骨力遒勁，筆勢飛動。這種書寫風格的個體差異，使得透過筆跡分析，可對書寫者的身份、風格流變、乃至書法流派的傳承進行細緻考察。歷代書法評價亦強調此一現象，例如「顏筋柳骨」之稱，即顏真卿書法筆力雄健、筋肉豐厚，柳公權則以剛勁峻拔、骨力遒美著稱。歐陽詢的楷書嚴謹端正，被後世推崇為「楷書極則」，皆反映了不同書法家的筆跡個性與風格特徵。正因為書者之間在筆法、結構、運筆方式上各有異同，因此，書跡鑑定得以成為判斷書者身份、考察書法風格演變、乃至推定古籍版本源流的重要方法。

在筆跡鑑定領域，「穩定性」指的是書寫者在其文字中反覆出現並固定化的筆跡特徵，即長期習慣性的書寫模式所形成的筆跡個性。這些特徵包括筆畫的形態、結構比例、筆勢流動，以及特定字形的書寫方式，經過多次觀察與比對，能夠確認書寫者的固有特質。「個人差」則指不同書寫者之間筆跡風格的顯著差異，這些差異反映了書寫者獨特的習慣與風格，屬於「個人差」的形成與識別範疇。例如，同一字形在不同書寫者的筆下可能表現出結構鬆緊、筆勢剛柔、起筆收筆的差異，這些都能成為筆跡鑑定的重要依據。「稀少性」指偏離個人穩定筆跡特徵的罕見筆跡變異，這可能由於一時書寫狀態、情境影響，或其他外部因素造成。例如，某字在大部分情況下的筆勢、結構固定，但偶爾因筆勢急促、紙張材質影響等原因，出現異常筆畫，這類特徵雖不具代表性，卻可能提供判定書寫真偽的輔助依據。筆跡個性的判

[25] 明・楊慎著，鄭寶琛纂輯，王文林編次，李守福、郭宗儀同校：《升菴合集・書品》（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古籍庫館藏，光緒 8 年〔1882〕新都鄭寶琛刊本），卷 169，葉 1。

定不僅限於單個字形或其組成筆畫的長短與位置，更涉及字與字之間的間隔、交叉與接合方式、筆順與運筆方向等細節。此外，異體字的使用習慣、錯別字的出現頻率、文字的配置方式、字裡行間的間距，甚至書寫時自然形成的餘白分布，皆能反映書寫者的筆跡特徵與習慣。

因此，「筆跡鑑定」的核心在於識別並分析書寫者筆跡中具有「穩定性」、「個人差」與「稀少性」的特徵，透過綜合比對多份書寫樣本，以判定是否出自同一書寫者之手。這一方法不僅適用於傳統書法領域的書跡鑑定，也可進一步拓展至雕版書籍的書手辨識，從而為板刻書法研究提供標準化的分析規範，並對版本學、書法史的研究帶來新的視角與方法。

筆跡鑑定必須綜合考察「運筆狀態」、「字劃形態」與「字劃組成」三個核心要素，並對檢查結果進行系統性的綜合分析，以確認書寫者是否為同一人。因此，若缺少其中任何一項，則無法達到高度準確的鑑定標準。這一鑑定標準的理論基礎在於：字劃乃是運筆的結果，而文字則是由字畫組成。人在學習書寫時，並非獨立學習運筆、形態與組成，而是直接掌握整個文字的書寫方式，並透過長時間的練習內化為個人習慣。因此，書寫行為本質上是大腦發出指令，經由肌肉運動控制書寫工具，並藉由視覺與動覺的反饋進行調整，最終形成穩定的筆跡特徵。「運筆」受到整體書寫行為的影響，因此其結果必然與字劃形態和字劃組成密切相關，不能單獨考察某一環節而忽略其他要素。

在法科學領域，「文書鑑定」對於筆跡的定義為：「寫字行為的一部分，並透過筆跡形態遺留下來的可視特徵。」[26]這一觀點強調，筆跡並非單純的靜態符號，而是動態書寫行為的具象表現。綜合而言，「筆跡」是筆跡個性的穩定性與筆跡的個人內變動相結合的產物。前者指書寫者長期固定的筆跡特徵，後者則是因書寫狀態、工具、環境等因素產生的細微變異。[27]透過綜合分析這兩大面向，得以建立嚴謹的筆跡鑑定方法，進一步應用於書法研究、雕版書籍的書手辨識，以及版本學的精細考證。[28]

---

[26] 朱富美：〈筆跡鑑定之研究〉，《台灣法學叢刊》第 48 卷第 3 期（2003 年 7 月），頁 1-44。

[27] 徐聖熙：〈筆跡鑑定之理論與實踐〉，《台灣法學叢刊》第 4 卷第 4 期（1959 年 10 月），頁 87。

[28] 林玟君：〈書跡鑒定於漢籍書志學之應用——以《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之傳藏考證為例〉，世

（二）版下清書（筆耕、筆工）與雕版字樣學

關於江戶時期和刻本漢籍的字樣研究，舉如祇園南海（1676-1751）《南海先生文集》之字樣分析，堀川貴司曾在論文中對其風格特徵有所論述：「（字樣）線條柔和，字形趨於正方，較少出現右上傾斜的現象。本書的字樣相較之下更為工整方正，與《詩作便覽書》等作品相比，整體風格略顯稚拙。（筆者譯）[29]」這一觀察顯示出江戶時期和刻本在雕版風格上的細微差異，亦可作為進一步探討書籍版本流變與刊刻特色的重要依據。

若依循此研究方法與觀察視角，檢視明代至江戶時期所出版的諸多典籍，可以發現參與書籍生產的職人——如負責「版下清書」的筆耕（筆工）——在書寫時往往以楷書為主要書體，以確保版面整潔、字跡端正，並符合讀者易於閱讀的基本需求。因此，這類職人書寫的字樣，特別強調線條工整、結構嚴謹，整體風格趨於規範化。然而，正因如此，印刷出版品的字樣往往呈現出字體端莊嚴整，然風格統一而缺乏個人筆跡的獨特性，形成「千篇一律」的雕版書法風格。

然而，倘若進一步深入觀察江戶時期出版書物的文字特徵與細部筆畫結構，則可發現，即便在同一部文集中，各卷各葉的筆跡仍然存在細微的差異。這些差異可體現在筆畫線條的粗細、起筆與收筆的角度、點畫之間的連結與轉折方式、筆勢的彎曲程度或是否向右上方微微傾斜，乃至於字距與行距的變化等方面。換言之，每一個字、每一句話、甚至整篇章節的卷面布局，都能確切地反映出書寫者的個人風格。透過這些筆跡特徵的比較分析，不僅能辨識出同一筆耕者在不同部分的書寫特徵，亦能從字跡間細微的個人書寫風格中，發掘出可能由不同筆耕者執筆的痕跡，進而為版本研究與書籍流傳過程中的筆工群體探討提供更細緻的依據。

因此，本文在探討《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各卷字樣的筆跡特徵時，將以書法筆法分析的基準之一——「永字八法」作為檢核標準，針對不同版本進行細緻的

界漢學研究會編：《第五屆世界漢學論壇會議論文集》（德國：維藤大學，2021 年），頁 205-261。

[29] 〔日〕堀川貴司：〈漢籍から見る日本の古典籍——版本を中心に—〉，《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調查研究報告》第 34 號（2014 年 3 月），頁 23。

辨析。透過「永字八法」所涵蓋的八種基本筆畫——側、勒、努、趯、策、掠、啄、磔——從起筆、運筆、收筆的方式，檢視字跡筆劃的流暢度、筆勢的強弱、結構的緊密或疏朗，辨識筆耕者的個人書寫習慣。

基於此分析方法，本文嘗試從筆跡特徵推求並回溯文集正文內容的版下清書狀況，探討在刊刻過程中，遞修本與覆刻本之間，字樣風格究竟發生了何種變化，透過對各卷字樣的具體比對，進一步推敲筆耕者是否分工書寫不同卷次，亦或在修訂、覆刻過程中，由不同筆工接續補寫，使得書籍內部字跡風格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差異。以下將逐一羅列各卷字樣的主要特徵，並對其風格落差進行詳細說明，以期勾勒出刊刻過程中筆耕者群體的書寫風貌與文本流傳中的筆跡變異特徵。

1、丙本（明刊本・遞修本）

遞修本丙本的最大書誌特徵，在於其不僅保留了明刊本的板刻內容，亦包含江戶時期鈔補的「補鈔」「補配」。其中，卷之一第二十二葉、卷之二第十四葉、卷之三第六葉，皆非原刊明本書葉，而為江戶時期補配之謄抄扉（見圖 12）。關於此三葉補鈔補配的具體時間與執筆者，史料已無從考證，然從書寫風格觀察，其字體呈現近似「六朝小字」之特徵，與祇園南海《南海先生集》、服部南郭《大東世語》所見書風相類，[30]顯示其鈔寫者可能具備深厚的漢籍書法素養。丙本之印刷品質整體而言不甚精良，字跡漫漶、模糊之處時有所見，惟根據補鈔補配葉之存在，推測其版本流傳歷程應為：明刊本傳入江戶後，經收藏者保存，因缺葉之故，收藏者（服部家）參照原書補鈔，補全書頁。此一補鈔補配現象，反映明刊本在江戶知識文化圈中的流通與傳藏，為探討中日書籍流傳提供重要的書誌學線索。

30 林玟君：〈勘破「連綿」：論宋人『草訣百韻歌』筆法字學要義與結字構形原理〉，《漢字漢文應用研究》第 1 卷（2022 年 11 月），頁 43-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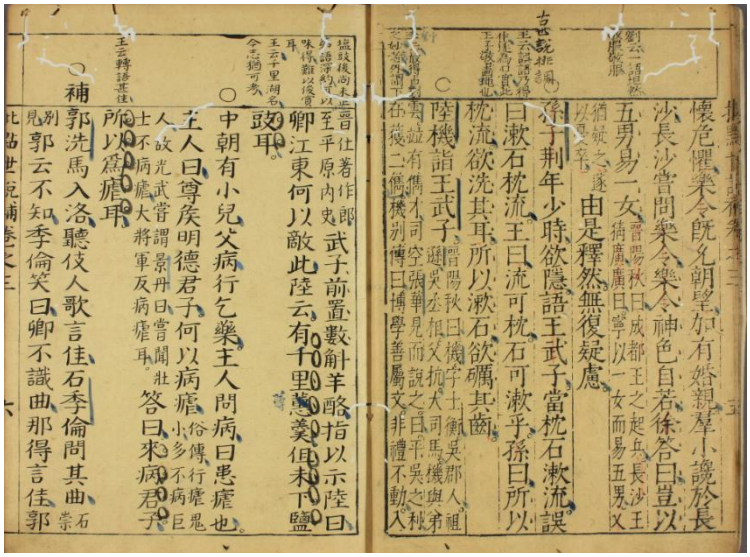


圖 12　丙本（遞修本）明刊本書葉與江戶補鈔補配葉比較

2、丁本(和刻本 A・覆刻本)

風格	雕版風格一	雕版風格二
卷次	卷之一、卷之三、卷之四、卷之五、卷之七、卷之十、卷之十一、卷之十二、卷之十三、卷之十四、卷之十七、卷之十九、卷之二十	卷之二、卷之六、卷之八、卷之九、卷之十五、卷之十六、卷之十八

和刻本漢籍的覆刻與明刊本之間的最大差異，在於筆耕摹寫、複寫時對漢字字形的掌握與詮釋方式。雖然和刻本的雕版刻工試圖忠實覆刻明刊本的明朝體字樣，但由於筆耕者對漢字書法風格的理解與運筆習慣不同，往往導致所摹寫的字形與原初明朝體存在顯著落差。這些細微的筆劃變異，正可作為區辨不同雕版筆耕風格的重要依據，並進一步推測參與覆刻過程的筆耕人數及其分工模式。

以丁本為例，全書 20 卷，其書體風格可區分為兩類，顯示至少由兩名筆耕工匠負責不同部分的摹寫與雕版工作。其中，風格一（圖 13）所呈現的字形與原初明朝體差異較大，字形較為方正，筆畫線條趨於硬直，且字距明顯緊密，部分版面甚至

因佈局過於擁擠，導致訓點符號排列紊亂，影響可讀性。風格二（圖 14）則與明朝體較為接近，字形整體偏長方形，筆劃較具流動感，字距相對疏朗，使得整體板面結構較為清晰工整。

進一步分析個別版面的文字特徵，可觀察到風格一（圖 13）卷之七右側第四葉下第一行第六字與第十二字、第八行第二字與第八字「之」字，右撇筆畫顯著高於左側筆劃，且最後一筆捺筆較為厚重，筆畫之間粗細落差明顯，顯示書寫者在臨摹時可能受到其自身書寫習慣影響，未能完全再現明刊本的筆勢。相較之下，風格二（圖 14）卷之六右側第四葉下第七行第十六字「之」字，其右撇筆畫傾斜角度較平緩，且筆畫粗細落差較小，與明刊本的原始字體風格更為接近。

綜合以上觀察，可推測丁本的覆刻過程可能涉及不同筆耕工匠的分工，由於筆耕者的書寫習慣、筆法特徵與臨摹準確度有所不同，導致不同卷次的字體風格呈現出系統性的變異。這些筆跡差異，除了可作為判別和刻本雕版工藝與筆耕技術的重要依據外，亦可進一步反映江戶時期書坊在翻刻明刊本時的工序安排與人員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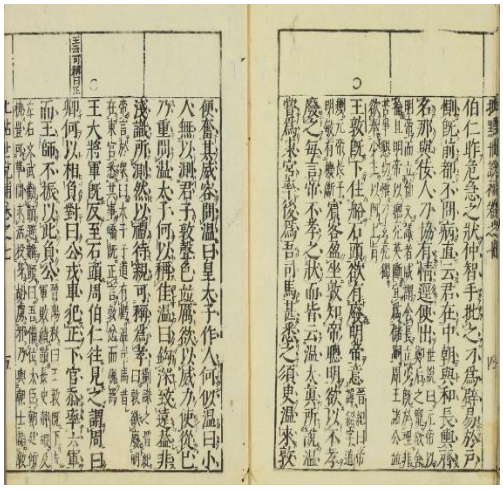


圖 13　丁本（和刻本 A）雕版風格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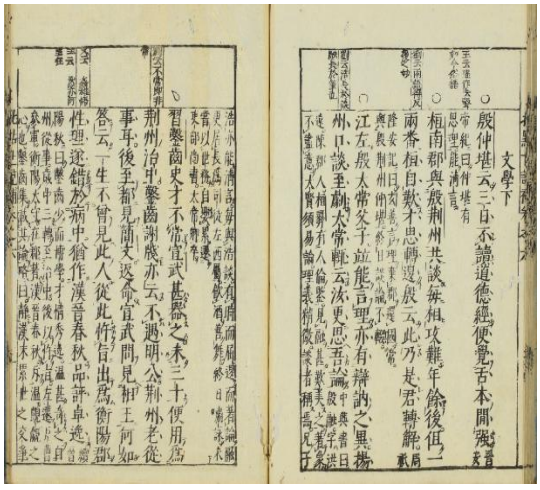


圖 14　丁本（和刻本 A）雕版風格二

3、戊本（和刻本 B・覆刻修印本）

風格	雕版風格一	雕版風格二	雕版風格三	雕版風格四
卷次	卷之一、卷之二、卷之三、卷之四、卷之七、卷之九、卷之十、卷之十四、卷之十七、卷之十八、卷之十九、卷之二十	卷之五、卷之八、卷之十三	卷之六、卷之十一、卷之十二	卷之十五、卷之十六

戊本作為重修再刊之版本，其對明朝體字樣的掌握較丁本更為準確，整體雕版工藝與印刷品質亦顯著優於丁本。相較於丁本雕版風格的筆耕差異，戊本的雕版筆法雖更趨工整，然仍可觀察到至少四種截然不同的書寫風格，顯示其雕版工作可能由多位筆耕工匠分工完成。第一種風格（圖 15），其字體較大且方正，用筆力道較重，筆畫整體較粗，字距偏緊，呈現出雕刻時刻意強調線條力度的特徵。第二種風格（圖 16），其字形接近正方形，特別是所有豎畫筆劃（包括垂露、懸針、豎鉤）均刻意加重，營造出豎畫較為厚重的視覺效果。第三種風格（圖 17），則為全書所有版面中對漢字筆畫掌握度相對較弱的一類，雖然覆刻自明刊本，但其對於明朝體筆法的理解仍顯生疏，故筆畫組成顯得僵硬，線條生澀缺乏流暢度。第四種風格（圖 18），則為戊本中雕版品質最高、亦最接近原刊明朝體的一類，其筆法運用成熟，字體風格與明刊本基本一致，顯示筆耕者對原本字體特徵有較精準的臨摹能力。

進一步比較各版面常見字的形態差異，可見各雕版風格間的筆法特徵與運筆習慣有所不同。例如，在風格一（圖 15）中，卷之一第九葉下第三行第十五字「人」，左撇較長，且筆畫較細，顯示筆耕者運筆時習慣收斂線條，避免筆畫過於粗重；而在風格二（圖 16）中，卷之五第六葉上第六行第九字與第七行第七字「人」，左撇相對較短，且無筆法拖長之勢，左右撇捺筆畫粗細較為接近，落差較小，呈現出筆劃結構的規整性。此外，風格一（圖 15）中，卷之一第九葉下第九行第十五字「之」，

整體筆畫較細，各筆劃粗細均勻，落差不大；風格二（圖 16）中，卷之五第六葉上第一行第六字與第二行第七字「之」，筆畫則較為厚實圓潤，顯示出雕版者可能特別加重了筆畫力度。另一方面，風格三（圖 17）中，卷之十一第七葉下第七行第三字「之」，筆畫結構顯得僵硬，各筆劃之間的粗細落差較小，反映出筆耕者對明朝體字形掌握的不熟練；而風格四（圖 18）中，卷之十五第二葉下第二行第十七字「之」，最後一筆捺筆則呈現圓潤的下凹弧度，且相對較長，筆畫間粗細落差明顯，與原刊本的筆勢最為接近。

由上述筆跡特徵可推測，戊本的雕版工作應由不同筆耕工匠分工負責，各筆耕者的筆法風格與對明朝體的理解程度不同，導致版面間呈現出明顯的書寫差異。此一現象進一步顯示，在江戶時期的和刻本翻刻過程中，筆耕者並非統一培訓，而可能來自不同書坊或具不同書法訓練背景，進而影響雕版結果的統一性與精確度。透過對戊本不同書風的細緻比較，可更深入理解和刻本在翻刻過程中的筆耕風格變異，進而提供判別江戶時期漢籍雕版技術及書籍製作機制的重要書誌學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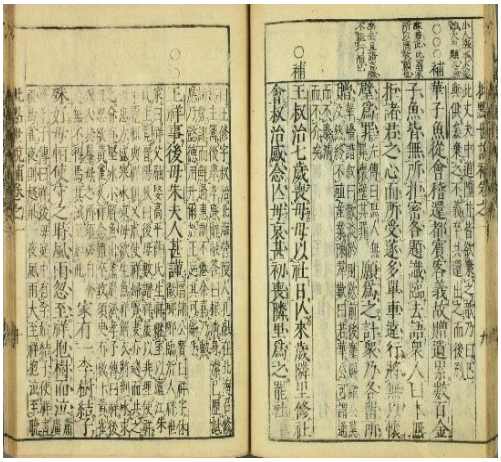


圖 15　和刻本戊本雕版字樣風格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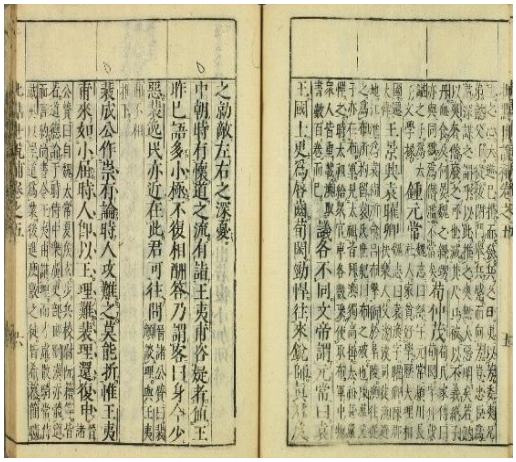


圖 16　和刻本戊本雕版字樣風格二

圖 17　和刻本戊本雕版字樣風格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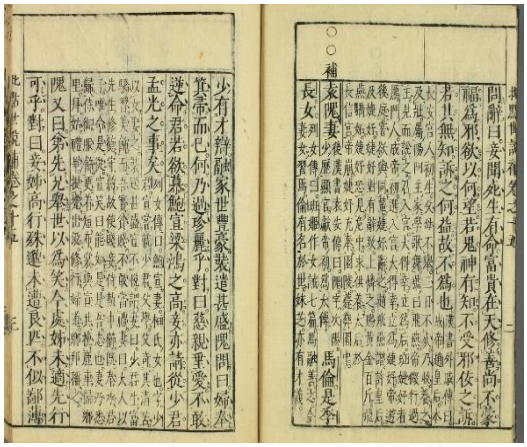


圖 18　和刻本戊本雕版字樣風格四

五、結語

本文透過對《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從明刊本至和刻本的全面書誌調查，結合各版本系統間的相承關係、江戶時期日本的出版文化實態，以及雕版字樣學與版下清書字樣風格的辨析，嘗試突破既往版本考證與出版流通研究的侷限，將書誌學的視野拓展至雕版印刷層面，深入探究書籍製作的實際過程。透過對不同版本的字樣細節與筆跡特徵的比對分析，本文不僅試圖重建書籍刊刻的歷史脈絡，也進一步勾勒出參與刊刻的筆耕在書籍製作過程中的具體貢獻，並藉此呈現書籍從原刊、遞修到覆刻的流變軌跡。更重要的是，本文將古典籍視為歷史流傳的文化物件，透過對書寫痕跡與雕版技術的考察，尋繹出版與刊刻過程中，工匠職人所遺留的蛛絲馬跡，藉以還原更完整的書籍製作史與雕版傳承脈絡。

本研究透過《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的版本考察，建立了具體的書誌學分析架構，並驗證以下五項主要成果：（一）系統整理《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明刊本－和刻本」的書誌資料，進行解題與版本系統考證。（二）歸納整理其版本流傳脈絡，確立五大版本系統：甲（明刊本・原刻本）、乙（明刊本・修本）、丙（明刊本・

遞修本）、丁（和刻本 A・覆刻本）、戊（和刻本 B・覆刻修印本）。（三）確認兩部和刻本的刊行者「京都文會堂九兵衛」，分別為初代林九兵衛（儒者林義端）與第二代林權兵衛。（四）透過書前附錄序跋與雕版字樣學，考證和刻本的刊刻底本：丁本（和刻本 A）可能依據丙本（遞修本）相近的底本，戊本（和刻本 B）的正文漢文內容則源自甲本（原刊本），其漢文訓點則參照丁本（和刻本 A）修訂重刊。（五）將筆跡鑑定方法引入漢籍書誌學，根據遞修本與覆刻本的版面字樣風格差異，推測刊刻過程中可能雇用的筆耕人數，並藉由「善本古籍」作為歷史流傳物，細緻爬梳其中書物線索，力圖復原明代至江戶時期的出版文化與歷史時空場景。本研究在漢籍書誌學的架構下，嘗試透過版本系統與筆跡考證等多重維度，深化對《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及其跨文化流傳的學術理解，並為明清江戶的書物傳播研究提供進一步的參照。

徵引文獻

一、古籍文獻

＊唐・李延壽撰：《南史（底本：元大德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全文資料庫》網站，網址：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0^2132653306^90^^^../hanjimg/hanji.htm（2025 年 1 月 15 日上網）。

＊明・楊慎撰，清・李調元校定：《墨池瑣錄》，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古籍庫館藏，光緒 7 年〔1881〕8 月《函海》本。

＊明・楊慎著，鄭寶琛纂輯，王文林編次，李守福、郭宗儀同校：《升菴合集》，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古籍庫館藏，光緒 8 年〔1882〕新都鄭寶琛刊本。

＊江戶・荻生徂徠：《荻生徂徠全集》第 1 卷，東京：みすず書房，1973 年。

二、今人論著

＊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年。

王海暉等：《圖像分析與識別新技術研究與應用》，湖北：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 年。

王成章、馬少堯：〈筆跡個性鑑定〉，《憲兵學術季刊》第 43 期（1998 年 11 月），頁 62-68。

朱富美：〈筆跡鑑定之研究〉，《台灣法學叢刊》第 48 卷第 3 期（2003 年 7 月），頁 1-44。

李闓廷、鄭國明：〈影像辨識之物件形狀分析技術探討〉，收入社團法人台灣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編：《2023 第十九屆科技教育研究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2023 第十二屆工程、技術與 STEM 教育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2023 年，頁 811-826。

林玟君：《楊慎「六朝學」研究——兼論江戶時代荻生徂徠的容受》，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0 年。

林玟君：〈書跡鑒定於漢籍書志學之應用——以《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之傳藏考證為例〉，世界漢學研究會編：《第五屆世界漢學論壇會議論文集》，德國：維藤大學，2021 年，頁 205-261。

林玟君：〈勘破「連綿」：論宋人『草訣百韻歌』筆法字學要義與結字構形原理〉，《漢字漢文應用研究》第 1 卷（2022 年 11 月），頁 43-64。

周彥文：《毛晉汲古閣刻書考》，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 年。

徐聖熙：〈筆跡鑑定之理論與實踐〉，《台灣法學叢刊》第 4 卷第 4 期（1959 年 10 月），頁 86-94。

翁淑緣：〈漢字筆跡與人格關係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44 期（2016 年 9 月），頁 77-97。

陳玉女：《明清嘉興楞嚴寺《嘉興藏》之刊印與其海內外流通》，《佛光學報》新 6 卷第 1 期（2020 年 1 月），頁 123-204。

＊陳用佛：〈遺囑筆跡鑑定〉，《警專論壇》第 5 期（2012 年 12 月），頁 57-61。

陳虎生：〈筆跡鑑定的探討〉，《警學叢刊》第 26 卷第 5 期（1996 年 3 月），頁 17-29。

張彥卿：《漢字筆跡與人格及心理健康關係之初探》，新北：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2018 年。

詹明華、陳弘斌、陳炯廷：〈模仿筆跡之鑑定〉，《中央警察大學學報》第 39 期（2002 年 4 月），頁 427-446。

葉淑慧：〈存散與流傳：明清毛晉汲古閣刊刻《六十種曲》及其現存版本探析〉，發表於「首屆兩岸四地宮廷戲曲研究論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故宮博物院主辦，會議日期：2015 年 11 月 10 日-11 日。

劉家幸：〈平安朝和漢文學對《世說新語》之受容〉，《漢學研究》第 32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頁 161-192。

劉家幸：《日本江戶漢文世說體著作之受容與生成》，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

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年。

＊〔日〕小川剛生、中野真麻理編：《表紙文様集成》，東京：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調查收集事業部，2004 年。

〔日〕今田欣一著，Eric Liu、Metaphox 譯：〈宋朝體與明朝體的流變——漢字字體歷史〉，特輯：活字字體的基礎講座（活字書體の基礎講座），《欣喜堂》網站，網址：https://www.thetype.com/kinkido/kinkido-3/zh-hant/（2025 年 2 月 3 日上網）。

〔日〕戶川芳郎著，廖明飛譯：〈毛本《十三經注疏》的九篇序——新獲《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書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24 卷第 2 期（2014 年 6 月），頁 163-171。

＊〔日〕長澤規矩也：《漢籍解題》，收入《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 10 卷，東京：汲古書院，1985 年。

＊〔日〕堀川貴司：〈漢籍から見る日本の古典籍——版本を中心に—〉，《國文學研究資料館調查研究報告》第 34 號（2014 年 3 月），頁 13-23。

＊〔日〕稻田篤信：〈和刻本『世說新語補』の書入三種〉，《日本漢文學研究》第 8 號（2013 年 3 月），頁 1-17。

〔日〕藤本幸夫編：《書物・印刷・本屋——日中韓をめぐる本の文化史》，東京：勉誠出版社，2021 年。

《朝日日本歷史人物事典》網站，網址：https://kotobank.jp/word/%E6%88%B8%E5%B4%8E%E6%B7%A1%E5%9C%92-1094519（2025 年 6 月 18 日上網）。

《臺灣國家圖書館「古典籍特藏文獻資源・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網站，網址：https://rbook.ncl.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5fff00dcf8f4465faca7613e6b38824afDc0NTA40&page=1&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2025 年 1 月 15 日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Atsunobu Inada, “Three Types of Annotations in the Japanese Edition of Shi Shuo Xin Yu Bu”, *Journal of Kanbun Studies in Japan* 8 (Mar. 2013), pp. 1-17.

Chen Yong Fo, “Testament Handwriting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olice Academy Forum* 5 (Dec. 2012), pp. 57-61.

[*Tang*] Li Yan Shou, *Nan Shi (Di Ben: Yuan Da De Ben)* [History of the Souther n Dynasties (Base text: Yuan Dade editio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 ogy, Academia Sinica. URL: 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50^2132653306^90^^^../hanjimg/hanji.htm (Accessed: 15 January 2025).

Nagasawa, Kikuya, *Han Ji Jie Ti* [Bibliographical Studies on Chinese Books], included in *Chang Ze Gui Ju Ye Zhu Zuo Ji* [Collected Works of Nagasawa Kikuya] Vol. 10 (Tokyo: Kyuko Shoin, 1985).

Ogawa, Takeo and Nakano, Mamari eds., *Biao Zhi Wen Yang Ji Cheng* [Collection of Cover Designs] (Tokyo: Department of Research and Collection, National Institute of Jap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Institutes for the Humanities, 2004).

[*Edo*] Ogyu Sorai, *Di Sheng Cu Lai Quan 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Ogyu Sorai] Vol. 1 (Tokyo: Misuzu Shobo, 1973).

Takashi Horikawa, “Japanese Classical 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Books – Focusing on Printed Editions”, *National Institute of Japanese Literature Research Reports* 34 (Mar. 2014), pp. 13-23.

Wang Neng Xian, *Shi Shuo Xin Yu Yan Jiu* [A Study on Shi Shuo Xin Yu] (Jiangsu: Jiangsu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2).

[*Ming*] Yang Shen, Li Diao Yuan revised, *Mo Chi Jiao Lu* [Mochi Zuo Lu, vol. 4 (August, 7th year of Guangxu, Han Hai collection, fascicle 20, bundle 12)] (Tokyo: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kyo, 1881).

[*Ming*] Yang Shen, Zheng Bao Chen compiled, Wang Wen Lin ed., Li, Shou Fu and Guo, Zong Yi collated, *Sheng An He Ji* [Collected Works of Sheng’An] (Tokyo: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kyo, 1882).